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

——觀念史／概念史視域與方法

鄭文惠*

摘要

本文主要以觀念史／概念史視域與方法，探討近代中國知識／思想轉型時期，概念／觀念作為一個研究對象的可能路徑與方法。文中比較美、英、德觀念史、概念史學術進路與方法異同及中國近代知識轉型中有關概念／觀念的義界；並提出「中國／東亞／全球」由「節點」到「網絡」的比較概念史的研究框架，以勾勒近代中國自我與他者觀念域文化交涉的大歷史結構。此外，除文字文本外，當同時關注圖像、影像、儀式等多重中介，結合觀念史／概念史／隱喻學，以進行概念傳布與觀念形塑的跨文化考掘學的研究。另，在知識微縮革命與大數據新時代命題下，若能有效結合人文思維與數位技術、統計理論，進行關鍵詞與關鍵詞叢共現頻度所呈顯的概念／觀念群的關係結構，及「觀念·事件·行動」互動之大歷史結構的數位人文研究，或能開啟觀念史／概念史由「語言」到「數位人文」轉向的研究新範式，而推進觀念史／概念史研究革命性的蛻變與突破。

* 作者現任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關鍵詞：觀念史、概念史、近代中國、知識轉型、概念變遷、東亞、
數位人文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 Idea Making in Modern China
—Vision and Methodology of
History of Ideas / History of Concepts**

Cheng Wen-huei

Abstract

This paper, by means of the horizon and methodology of history of ideas, discusses how “idea/concept” could be a research subject in the conceptual transition of knowledge in modern China. I compar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mong three diverse histories of ideas (in the U.S., the U.K., and Germany) to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 To capture how the notions of “self” and “other” were co-transformed in this transition from a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I propose to read modern China as a pivot in comprehending East Asian or even global context of history of ideas. In addition to textual evidence, images, rituals and other media, combined with metaphorology, and history of ideas, should be studied in order to complete trans-cultural archaeology. Moreover, apply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statistical theories to analyzing certain key words, concepts, and the interactions among “ideas,” “events” and “actions” would extend the scholarship of history of ideas from current linguistic

perspective to the one of digital humanities. It can be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in the near future.

Keywords: history of ideas, modern China,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concepts, East Asia, digital humanities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

——觀念史／概念史視域與方法^{*}

鄭文惠

一、前言

本文主要以觀念史／概念史視域與方法，探討近代中國知識／思想轉型時期，概念／觀念作為一個研究對象的可能路徑與方法。全文分從一、概念／語境／關鍵詞：觀念史／概念史的研究進路；二、概念變遷／觀念形塑：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思想啟蒙；三、中國／東

^{*} 本文曾於2012年11月13-17日以「觀念史方法與中國研究」為題，在日本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東亞的知識交流——關鍵概念詞的再檢討」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演講，後修改為〈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史方法與視域〉，2013年3月18-20日於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舉辦的「東亞近代知識轉型中的關鍵概念詞」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今再修改，並補入近代中國思想家對觀念、概念之詮解等。原演講稿修改後，以〈觀念史方法與中國研究〉為題，收入《東亞的知識交流——關鍵概念詞的再檢討》（京都：日本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3年12月）一書。本項研究中關於「概念」、「觀念」的詞彙資料，取自於「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開發，劉青峰主編）。現由臺灣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計畫持續開發功能與完善數據庫並提供檢索服務。另，兩位審查委員的細心指正及邱偉雲博士的協助校正，謹一併致上謝忱！

亞／全球：自我與他者觀念域的文化交涉；四、互文／隱喻：觀念／概念的跨文化考掘學；五、「觀念／事件／行動」互動的大歷史結構：由「語言」到「數位人文」的轉向等面向論述。文中除比較美、英、德觀念史、概念史學術進路與方法異同及中國近代知識轉型中有關概念／觀念的義界外，並提出「中國／東亞／全球」由「節點」到「網絡」的比較概念史¹的研究框架，以勾勒近代中國自我與他者觀念域文化交涉的大歷史結構。此外，除文字文本外，當同時關注圖像、影像、儀式等多重中介，結合觀念史／概念史／隱喻學，以進行概念傳布與觀念形塑的跨文化考掘學。另，在知識微縮革命與大數據新時代命題下，若能有效結合人文思維與數位技術、統計理論，進行關鍵詞與關鍵詞叢共現頻度所呈顯的概念／觀念群的關係結構，及「觀念·事件·行動」互動的大歷史結構的數位人文研究，或能開啟觀念史／概念史從「語言」到「數位人文」轉向的研究新範式，而推進觀念史／概念史研究革命性的蛻變與突破。

二、概念／語境／關鍵詞： 觀念史／概念史的研究進路

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概念雖源於法國啟蒙運動，但遲至1922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成立觀念史學社，始揭示出觀念史研究的宗旨。² 其中真正奠基的是諾夫喬伊

¹ 有關比較概念史，參見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104-112。此處所謂「中國／東亞／全球」由「節點」到「網絡」的比較概念史研究，更偏重一種以新的數位技術方法與統計理論模組，勾勒近代中國自我與他者觀念域文化交涉的大歷史結構。請參見本文第五節。

² 1922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成立觀念史學社，進行「一般哲學概念、倫理概念和美學風尚，還有文學發展和影響的歷史研究，以及揭示哲學史、科學史和政治、社會運動史的相互聯繫的觀念和思潮的研究。」參見D. C. 艾倫：〈引言〉，收於〔美〕諾夫喬伊

(Arthur O. Lovejoy, 1873-1962) 在1938年創建《觀念史雜誌》(*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進而使觀念史研究在美國形成一個學科。諾夫喬伊認為觀念是在認識世界的長期過程中形成的，觀念構成思想的基本要素，而積存於人類思想的底層；思想以一種結構化的觀念系統存在著，可分解為諸多單位觀念(uni-ideas)與觀念叢(idea-complexes)，每一種觀念是由各種相互關聯的單元觀念組成，而單元觀念也是許多觀念的複合物。諾夫喬伊研究諸觀念的複合物的歷史，注重觀念的歷史起源、演變，及其作用與影響；觀念得以產生、變化、影響的心理學特徵；觀念群的發生與發展過程及其賴以產生的原則之間的聯繫。此外，也關注語詞在思想運動中真正起作用的因素，在判定語詞背後潛藏的觀念時，除須注意從一個意義向另一種意義轉移的語義學過程外，也須關注於思想史與趣味史中術語意義上的變換和含混的作用。甚而，觀念也演繹出認識規範和倫理規範的實踐史。³

然而，由於諾夫喬伊著重於尋找思想演進進程中經典文本中基本觀念意涵的必然存在性與觀念系統結構的恆久不變性，⁴一種在社會——歷史框架之外，超歷史、超社會的連續性的永恆巨鏈——表徵集體心靈的抽象觀念，因而劍橋學派政治哲學家普考克(J. G. A. Pocock, 1924-)與斯金納(Quentin Skinner, 1940-)即針對諾夫喬伊觀念史方法的非歷史性予以批判及修正。劍橋學派政治思想的歷史

(Arthur O. Lovejoy) 著，吳相譯：《觀念史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版)，頁2。

³ 參見〔美〕諾夫喬伊著，張傳有、高秉江譯：《存在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的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美〕諾夫喬伊著，吳相譯：《觀念史論文集》二書。

⁴ 〔英〕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著，任軍鋒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思想史研究》第1輯(2006年7月)，頁129-130。本文譯自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I,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57-89.

研究最大特點，是將思想史研究進行語言論轉向（Linguistic Turn），形成以話語為主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劍橋學派政治思想的歷史方法論，立基於英國哲學家約翰·奧斯汀（J. L. Austin, 1911-1960）的言語行為理論（Theory of Speech Act），而更注重「以言行效」⁵及言說主體的意圖與言說效應之間的關聯。奧斯汀將言語行為分成三個層面。一、以言表意（Locutionary Act）；二、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三、以言取效（Perlocutionary Act）。奧斯汀認為言語其實就是一種行動，言語所對應的是「正在進行的」事物；任何的話語行為，不僅是一個組詞造句，或是提供描述事實和狀態的過程；言說者同時也施作著多種行為，或完成某些行為。而言語行為則依賴於一定的社會規範和儀式。⁶劍橋學派政治思想家最具代表性之一的普考克作為新型歷史方法論的先驅，在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初期，提倡「語境主義」（contextualism，或譯「文脈主義」），關注於「文本在上下文中」（texts in context）的研究。普考克著重於語境歷史主義，強調在語境中的文本，文本涵義來自於所屬的語境或價值體系。作為一位研究政治話語的歷史學家，普考克所揭示的語境說，關注於陳述的語彙系統、結構或規則，及「以言行效」的語言使用層面，藉以掌握多重社會的話語或特定共同體的意識形態及世界觀。⁷而另一位劍橋學派代表學者斯金納則更關注於言

⁵ 參見 Quentin Skinner, "Interpret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peech acts,"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I,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03-127.

⁶ 參見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⁷ 參見 John Pocock,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What is History Toda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88), 114. Robert D. Hume, "Pocock's Contextual Historicism," in D.N. DeLuna e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History: Essays Concerning J. G. A. Pocock* (Baltimore, MD: Owlworks, 2006), 27-55. William Walker, "J. G. A. Pocock and the History of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Assessing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Eighteenth-Century Life* 33 (2009) No. 1, 83-96. John Pocock, "Concepts and Discourses: A

說主體的意圖與言說效應之間的關聯。正是言說主體的意圖構成了語言的「以言行事」維度與實施「以言行事」行動之間的紐帶，而言說主體所試圖利用語言的某種維度和資源，正是作為理解其正式言說的基礎。⁸ 因而，斯金納認為主要在於揭示重要言說的意涵和主題、言說主體的行動意圖，及其與言說的論爭語境之聯繫或關聯。斯金納認為言說行動深嵌於文本中，文本空間中承載著言說主體的行動意圖，而言說主體的行動意圖可以從通過理解其行動本身的習傳意義（conventional significance）與話語機制（discursive regimes）中把握。由於言說主體的話語行動，依照常規和慣例表達意向，因此，從語境還原言說主體於言說（saying）過程中的行為（doing），須關注於影響言說主體話語行為方式的常規或慣例，從而依照所用術語的本義和所指，理解言說主體的言說意圖，則能有效考掘言說者的意圖與言說效應間的關聯，並掌握語言與意識形態變遷的關聯。⁹ 正因將政治思想現象視為一種語境、言說者、言說行為、言說意圖的互動過程，因而，斯金納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著重於建構言說者意識形態的歷史脈絡以及言說者在此脈絡間不同層次的意圖。尤其政治思想中重要詞彙的語意轉變，往往承載了具有一定社會意涵的概念之轉變，象徵著集體對某些社會價值產生了認知上的改變。¹⁰ 因而，斯金納著重於從概念變遷與話語修辭的關係中，考掘概念的意義維度與話語行為之間的關係，從而認為只有不同概念／觀念運用以及運用這些概念／

Difference in Culture? Comment on a Paper by Melvin Richter,” in Hartmut Lehmann/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nor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Occasional Paper No. 15,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1996, 58.

⁸ [英] 昆廷·斯金納，任軍鋒譯：〈言語行動的詮釋與理解〉，《思想史研究》第1輯（2006年7月），頁139、140。

⁹ 參見[英] 昆廷·斯金納著，任軍鋒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思想史研究》第1輯（2006年7月），頁132、141、159、162。

¹⁰ 參見梁裕康：〈語言、歷史、哲學——Quentin Skinner 論之政治思想方法論〉，《政治科學論叢》第28期（2006年6月），頁116。

觀念時的不同意圖的歷史，¹¹ 進而逆轉了諾夫喬伊認為觀念是一具連續性、恆常性，宛如巨鏈般存在的主張。

至於，德國概念史學派，則奠基於史學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在1955年創辦的跨學科、跨文化、跨時間之關乎語言涵義與嬗變研究之《概念史文庫》（*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八卷本《歷史基本概念——德國政治和社會語言歷史辭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1972-1997），以及哲學家里特爾（Joachim Ritter，1903-1974）在《概念史文庫》基礎上主編之十三卷《哲學歷史詞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1971-2007）。科塞雷克所主張概念史之主要研究對象，是在社會文化變遷中不可或缺、無法替代的「基本概念」或「主導概念」（Leitbegriffe）。科塞雷克認為社會文化變遷必然在「基本概念」或「主導概念」中留下語義烙印；社會文化變遷必然沈積在「基本概念」或「主導概念」之中。正因，「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¹² 中，而概念又須藉由關鍵詞語予以指稱和識別，故而透過觀察社會和政治語彙中的「基本概念」或「主導概念」，在不同歷史語境中的語義生成條件、媒介和手段、內涵、演變、作用、影響——即指稱「概念」之關鍵詞語的語義擴展、縮斂、移位的變易過程——當可描述和勾勒出概念的常態、斷裂及其變化，從中得以揭示歷史變遷的特徵。因而，概念史學派關注在社會結構中語義生成與演變的歷史，亦即概念史通過考察語境，挖掘概念的語義結構，以確認「特定概念的建構能量」與演變軌跡，且更多地關注於「政治和社會事實與

¹¹ 參見〔英〕昆廷·斯金納著，任軍鋒譯：〈言語行動的詮釋與理解〉，《思想史研究》第1輯（2006年7月），頁141；梁裕康：〈語言、歷史、哲學——Quentin Skinner 論之政治思想方法論〉，《政治科學論叢》第28期（2006年6月），頁116。

¹² 方維規：〈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二十一世紀》總第111期（2009年2月），頁124-131。

其語言兌現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¹³ 科塞雷克概念史研究是一種關注於社會轉型期概念變遷的歷史宏觀考察，不同於斯金納集中探討較短時段中政治話語修辭作為一種概念的涵義變化。

在對概念變遷作歷史宏觀考察時，科塞雷克特別關注於在「經驗空間」(Erfahrungsraum; space of experience) 和「期待視域」(Erwartungshorizont; horizon of expectation) 的重層時間結構中，¹⁴ 必然影響著現代社會轉型中的「基本概念」或「主導概念」的建構與傳布問題。由於現代社會轉型期中，「基本概念」或「主導概念」連通著各種歷史經驗和社會期待，具體呈現時代最迫切的議題焦點，¹⁵ 此無疑使現代社會轉型中的「基本概念」或「主導概念」，指向於社會慣習、政治行動、歷史現實，乃至政治烏托邦等，涉及社會現實或理想構築等種種關鍵性的一切。因此，以關鍵詞語所標顯出的「基本概

¹³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the Geschichtliche," in Lehman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Ed. by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6) ; 方維規：〈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關於定義和方法以及相關問題的若干思考〉，收於馮天瑜編：《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版），頁12、14、16、19；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頁99。

¹⁴ 參見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 und Sozialgeschichte," in: *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 hrsg. von R.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9, 25-28. Reinhart Koselleck,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Conceptual Change," in Willem Melching and Wyger Velema, eds., *Main Trends in Cultural History: Ten Essays* (Amsterdam; Atlanta, GA: Rodopi, 1994), 10. John Zammito, "Koselleck's Philosophy of Historical Time(s) and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Review of *Zeitschichten: Studien zur Historik*," 128-129.

¹⁵ 科塞雷克：「與一般概念不同，《歷史基本概念》所探討的基本概念是政治和社會語彙中不可或缺、無法替代的概念。……基本概念連通各種經驗和期待，從而成為相關時代最迫切的焦點問題。」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eds. (Washingt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6), 64-65. 譯文取自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新史學》（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版），頁6。

念」或「主導概念」，既是歷史事實與社會期待的指示器，也是歷史經驗與社會變遷的沈積物，同時更涵具著現代轉型過程中的歷史建構能量，扮演著號召社會動員與文化認同的能動力量。也由於現代社會轉型中的「主導概念」或「基本概念」，往往是以關鍵詞語或「術語」加以標立、甄別而呈顯於話語行為中，因而，科塞雷克概念史研究，將表達概念的特定語彙——「術語」與語境作聯繫，從而揭示概念如何在社會變遷與文化行動的衝擊中形成與流變；也正是通過概念變遷的歷史語義學之考察，科塞雷克發現了德國現代思想觀念的形成及德意志民族形成的近現代歷史（1750-1850）。¹⁶ 由於科塞雷克著重考掘德國社會和文化發生巨變的轉型期中，有關現代概念形成與變遷的內在多重時間結構，因此，「概念」作為社會現代轉型的語言構造體與聚積體，實然集聚著「非共時的共時性」¹⁷ 之歷史現實與經驗、社會期待與目標；再者，「基本概念」或「主導概念」實質又具有語言可操控性及可意識形態化（Ideologisierung）特徵，從而可成為不同社會成員生活依存的話語結構或各種意識形態的論戰工具，因而，藉由釐析社會現代轉型期——鞍型期「基本概念」或「主導概念」的語義變遷，當可考察社會轉型期的時代現實經驗與歷史文化變遷，這是德國概念史學派的研究旨趣。

另如1958年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文化與社會 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一書，分析英

¹⁶ 科塞雷克主編《歷史基本概念——德國政治和社會語言歷史辭典》一書，通過一百多個概念（詞彙）的起源、定型和變遷的歷史語義學的考察，揭示德國現代思想觀念的形成，及其形成背後所牽涉的整個德意志民族形成的近現代史。書中將諸多歷史基本概念於大約1750年至1850年期間所體現出的時代化、政治化、民主化、可意識形態化等特徵，定名為「鞍型期」模式，用以指稱歐洲從早期近代走向十九和二十世紀，從前現代走向現代的「過渡時期」。參見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頁85-116。

¹⁷ Reinhart Koselleck,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Conceptual Change," 11.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62.

國在1780-1950年間文化與社會的變化，並附上60個詞彙的分析作為附錄。八〇年代則將原附錄詞彙獨立且擴大為130多條詞彙研究，輯為《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一書，提供了「關鍵詞／概念」研究的另一種方式。威廉斯通過考察「工業」(industry)、「民主」(democracy)、「階級」(class)、「藝術」(art)和「文化」(culture)等關鍵詞意義轉變的歷史，分析英國在1780-1950年間有關政治、經濟、社會的重大發展與轉折，勾勒出英國現代文化及整體的生活方式(the whole way of life)之重大變遷。威廉斯將與社會文化整體變遷「重要且相關」及「意味深長且具指示性」的詞命名為「關鍵詞」，著重探討「關鍵詞」在語言演變過程中詞義的變化，以及彼此間相關性與互動性的相互影響與語言演變過程中意義的變異性與複雜性。¹⁸

以上無論是科塞雷克以凝縮於「術語」的「基本概念」或「主導概念」研究德國現代轉型的社會變遷，或是威廉斯以「關鍵詞」研究英國文化變遷，二人都是通過以術語／關鍵詞為核心，考掘概念的意義變化，以揭示社會轉型期歷史文化演變的過程，方法上都是將詞彙的歷史語義學考察和概念／社會變遷研究建立起聯繫，而呈現為一門兼涵歷史和語言學的新學科。當然從具體的研究分析與方法論而言，德國概念史學派的影響力更為深遠。

由於概念／觀念往往憑藉著語言文字而得以成為一種具可認知性、可思想性、可溝通性及可分享性的公共思想或價值信仰；社會文化變遷過程中，又往往呈現為一種改變、翻轉舊語詞，及創造新語彙以表達對歷史現實與經驗、社會期待與目標的新認知；社會轉型期語言演變過程中意義的變異性所涉及思想觀念、價值信仰衝突、轉變的樣態，也往往凝縮、沈積為以「關鍵詞」的方式呈現。正因每個關鍵詞背後都涵藏著社會轉型期特定共同體的世界觀邏輯，故而透過關鍵

¹⁸ 參見〔英〕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導論〉，收於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1版)，頁7、15、16。

詞之歷史語義學的考掘，當可描摹出當時的社會意識與歷史變遷。因而，或可說歷史沉積、濃縮於「關鍵詞」，¹⁹「關鍵詞」是反映歷史與現實多重層關係及再現社會烏托邦藍圖的一種新現實文本；「關鍵詞」形成和意義轉變的歷史，不啻是一部社會文化變遷史。

然而，正因語言本是一個巨大的象徵系統，是先在於具體的言說與語境。西方語言論的轉向，已然關注於言說與語境之間不必然兩相重合或密切相關。在由「言說者言說語言」修正為「語言言說言說者」，強調言說者被語言所言說，被社會所塑造的同時，無論言說或行動，無疑都通過一種引用（recitation）關係依附於巨大的語言象徵系統之中。²⁰於是語言和言說者如何相互言說，或是語言和言說者相互言說之中何以／如何湧現／突變出關鍵詞／概念，又如何證成觀念系統的結構和社會文化的變遷歷史，或許是觀念史／概念史須再突破的課題。

三、概念變遷／觀念形塑：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思想啟蒙

近代中國由於西學東漸及日本轉植，容受了繁富多元的西方文明

¹⁹ 金觀濤、劉青峰將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歷史知識濃縮（incapsulated）於思想結構」及「歷史沉積於特定概念」之說，轉化為「歷史知識包含在某些關鍵詞意義形成之中」。見金觀濤、劉青峰：〈隱藏在關鍵詞中的歷史世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80。「歷史知識濃縮（incapsulated）於思想結構」之說，參見〔英〕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著，何兆武、張文傑譯：《歷史的觀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版），頁21-22。「歷史沉積於特定概念」之說，參見方維規：〈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二十一世紀》總第111期（2009年2月），頁124-131。

²⁰ 「語言和言說者互相言說」之語言觀，見〔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李鈞鵬譯：《身體之重：論「性別」的話語界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第1版）。另可參倪湛舸：〈語言·主體·性別——初探巴特勒的知識迷宮〉，收於前揭書，頁1-4。

與知識、概念，故而梁啟超（1873-1929）曾指出傳統的「舊字舊話」已無法承載「一天比一天複雜」的「人類的概念」，也不能借來「表新增的概念」，因其中所涵「概念內容」早已「相去萬里」。正因時代劇烈變化，語言文字「總不能以同速率的進步來應新增概念的要求」，²¹因而，近代中國揭開了一個新語新詞快速生成的新時代，以因應著劇烈變動的社會文化。

近代中國藉由西方與日本移植來的新語新詞及概念建構了一個新的知識場，也開啟了一個文化啟蒙與思想革命的新時代。當然，新型知識場的建構，除緣自於權力不對等的政治現實中逆動性的接受外，也涉及清代考據之學在與他者文化相遇時如何進入現代化表述的新課題。這種新型的現代化表述，主要以新詞新語標示出文明實體或概念範疇，因而，新語新詞與「舊字舊話」不免呈現出一種汰選的角力關係。近代中國新語新詞與「舊字舊話」的角力，實質涉及現代文明／傳統文化的角逐，「字」標示出一種歷史從未有過的文化能量與文明高度。因而，近代知識分子十分著重「字」所指向的文明屬性與概念義界。

當時思想家多意識到「字」承載了「概念」，而「概念之保存」也藉助於「字」。如徐彥之（1897-1940）翻譯〈邏輯漫談〉，載明「概念之保存藉助於符號，而符號常為一字。此字之真義，即此概念所含之表德，謂之內涵；概念表德所寓之物，謂之外延。」²²「字」承載了「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一個「字」往往指向於「一個概念或觀

²¹ 以上參見梁啟超：〈戴東原哲學〉（1923年），《飲冰室文集之（八）》（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8年），頁15-16。

²² 耶魯撒冷著，徐彥之譯：〈邏輯漫談〉，《新潮》第1卷第2期，1919年2月1日（上海：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本），頁316。馮友蘭〈名教之分析〉：「公名，即普通名詞，有私名，即固有名詞，有抽象名詞，有具體名詞等等。不拘何種名詞，其所指的，都是一個概念或觀念，其全體或其一部份，是可知而不可感覺的。」馮友蘭：〈名教之分析〉，《現代評論》二周年增刊，1927年1月1日，頁194。

念」；²³然而，人往往直接以「字」思考而獲致抽象之概念卻又渾然不覺。如陶履恭（字孟和，1887-1960）謂：

心靈之活動，自以文字或以有意義之符號為思想，而後較實物追想之象，範圍大擴。……有物有則，即會其意，無待圖解之說明。蓋符號印於眼簾，眼傳於腦，以字思想，不俟具體之物，而能有抽象之概念，然方吾思時，吾固未嘗自覺吾以字思也。²⁴

自古以來人類心靈之活動，以文字或有意義之符號為思想的主要觸媒，甚至是作為思想的本身。因中國文字符號形象性、視覺性強，文字符號「印於眼簾，眼傳於腦」，而直接獲致抽象的概念，以「字」思考，成了人不自覺的一種語言行為或思想行動；而「字」又承載了「概念」，是以近代思想家關注於人「以字思想，不俟具體之物，而能有抽象之概念」的思想活動。

梁啟超也強調「識字」和「聞道」關係密切，由「字」才能通「詞」，通「詞」才能通「道」，尤其「一個字表示一個概念」，如果「字的解釋弄不清楚，概念自然是錯誤混雜或囫圇；概念錯誤混雜囫圇，所衍出來的思想當然也同一毛病。」而思想錯誤，自然「影響延及社會」，所以「辯名當物，是整理思想第一步工夫。」是故，梁啟超在詮釋戴東原（名震，1724-1777）哲學時，評定他「把哲學上許多重要名辭，各各求出他本來的概念」，是做「思想上正本清源的工作」。²⁵正因「字」標顯、承載、保存了「概念」，人的心靈活動又習以為常的以「字」思考，因而，近代思想家十分看重「字」與「概

²³ 馮友蘭：〈名教之分析〉，《現代評論》二周年增刊，1927年1月1日（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影印本），頁194。

²⁴ 陶履恭：〈人類文化之起源·續前號〉，《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2月1日（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頁59。

²⁵ 梁啟超：〈戴東原哲學〉（1923年），《飲冰室文集之（八）》（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8年），頁15-16。

念」的關係及「抽象之概念」的思考方式與思想活動。

然而，何謂「概念」？「概念」由何而來？如何構造？近代中國思想家主要藉由西方心理學與邏輯學等學科知識去界定「概念」的義界。其中多認為「構造概念之時」，既「受過去感觸的支配」，²⁶又建立在「經驗」、「智識」與「能力」²⁷基礎上，是「認識的本體」，²⁸「一切思想知識的基礎」，²⁹「邏輯判斷之元質」；是一種「思想法式」，³⁰或「思惟作用」的「形式」。³¹如陳嘉謨認為「五官直接感受的現量」，「在意識上頭融會貫通起來」，就「成了概念 concept」，

²⁶ 王星拱：「若是各人過去的經驗不同，——例如生物學家有生物學家的經驗，化學家有化學家的經驗，——則其所構造的概念，自然可以不同。這些經驗都是過去的感受，足見我們構造概念之時，都受過去感觸的支配，並不是有一個獨立的我，可以毫無憑藉突如其來底在那裡構造啊。」王星拱：〈物和我〉，《新潮》第3卷第1號，1921年10月1日，頁8。

²⁷ 傅斯年：「經驗固不能得全體，然而集合各方面的經驗，便得一個全體的概念；經驗固不可盡憑，然而離經驗還有什麼可憑呢？」傅斯年：〈對於中國今日談哲學者之感念〉，《新潮》第1卷第5號，1919年5月1日，頁729。守常：「不論他是夢想的、或是科學的，都隨著他的智識與能力，把他的概念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守常：〈階級競爭與互助〉，《每週評論》第29期，1919年7月6日（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頁126。〈心理學研究法〉：「本能、情感、概念是精神構造底骨骼，是無數經驗組成的結果，是種族乃主有種族以前由遺傳而確定並且遞傳的。」〔法〕雷鮑（Tb. Ribot，法國國家學會會員法蘭西學院教授）原著，余家菊譯：〈心理學研究法〉，《少年中國》第4卷第8期，1923年12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頁43。

²⁸ 陳嘉謨：「『概念』就是『認識』的本體，『判斷』和『推理』就是『認識』的作用。」陳嘉謨：〈因明淺說〉，《新潮》第1卷第3號，1919年3月1日，頁415。

²⁹ 〔美〕杜威著，吳康、羅家倫譯：〈思想的派別（杜威講壇）〉，《新潮》第2卷第3期，1920年4月1日，頁494。

³⁰ 〈邏輯漫談〉：「概念者，邏輯判斷之元質也。顧此概念僅一思想法式，其在判斷，並無若何意義；然在邏輯，是則有其獨立腳步之值也。」耶魯撒冷著，徐彥之譯：〈邏輯漫談〉，《新潮》第1卷第2期，1919年2月1日，頁316。

³¹ 梁啟超：「論理學家謂：思惟作用有三種形式，一曰概念，二曰判斷，三曰推論。」梁啟超：〈墨子學案〉（1921年），《飲冰室文集之（二）》（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8年），頁43。

「有了概念，便可以替萬事萬物定個名，名就是概念的代表。」³² 梁啟超也認為：「名，是概念的表示。概念是經過總合、分析、比較才能發生。」³³ 馮友蘭（1895-1990）在論析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哲學方法時，表述為由「知覺（Perception）變為概念（Conception），把那概念，發為定義」³⁴的過程。馮友蘭分析名教時也說：「普通名詞代表一概念；此概念的義蘊，即是此普通名詞所指之物之要素、共相。這些要素或共相，若用言語文字表出，即是此名詞所指之物之定義」。³⁵

再者，概念與意識、知識、真理之關係為何？《二十世紀之支那》譯介的《西洋倫理學》云：「概念之生以反省為要」，「欲得真正之知識，不可不知自身之心象」，「反省之餘，更取他人之概念，而比較之，真理於是乎出。」是故「由批評而後得定見，由定見而後成概念，由概念而後有真正知識。苟名事物，而未組織概念，則真理無自而出。」³⁶ 知曉、反省自身之心象，而能評判而得定見，而成概念，而有真正知識；組織概念，方能探求真理。然而，概念的屬性為何？概念如何組織？由於「概念都是孤立的，只在一定的秩序中，依他們所能包容的，所能連累的來包容或連累之。」³⁷ 且概念又是「隨時變遷」³⁸，因而，思想家多著重於「觀察事物及其概念，是在它們的互

³² 陳嘉謨：《因明淺說》，《新潮》第1卷第3號，1919年3月1日，頁419。

³³ 梁啟超：《墨子學案》（1921年），《飲冰室文集之（二）》（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8年），頁43。

³⁴ 馮友蘭：〈柏格森的哲學方法〉《新潮》第3卷第1號，1921年10月1日，頁15。

³⁵ 馮友蘭：〈名教之分析〉，《現代評論》二周年增刊，1927年1月1日，頁195。

³⁶ [英] 後素：《西洋倫理學》，《二十世紀之支那》第1期，1905年6月3日（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影印本），頁21。

³⁷ 汪奠基：〈數學邏輯的產生〉，《少年中國》，第4卷第8期，1923年12月，頁60。

³⁸ 如梁啟超曾舉「諸夏」、「夷狄」，「為我族自命與命他之兩主要名詞。然此兩名詞所函之概念，隨時變遷。甲時代所謂夷狄者，乙時代已全部或一部編入諸夏之範圍，而同時復有新接觸之夷狄發現，如是遞續。」梁啟超：

相關連中，在它們的結合中，在它們的運動中，在它們的發生與消滅中。」³⁹

雖然概念隨時而變遷，但有其關連相累的運動秩序，概念之所以為概念，正由於概念具普遍性，⁴⁰ 故而具可認知性與可思想性的公共思想的特性。但要了解具普遍性意義的概念，必須備有相當的知識，在心理進化上，進到所謂能有「概念思想」(Conceptual Thought)的境域，如此才能歸納若干事物構造出概念。如同陶履恭舉「主義」作為一種概念，如果沒有相當的知識，無法進到「概念思想」的境域，不能構造概念的人，如何能希望瞭解一種主義。他說：

一個人要瞭解一種主義的意義，他必須在心理進化上，進到所謂能有概念思想 (Conceptual Thought) 的境域並且備有相當的知識。主義是一種概念，不能造概念的人，不能歸納若干事物成為抽象的觀念的人，如何能希望瞭解一種主義。⁴¹

正如陶履恭早在1917年即說過：「人之思想日進，智識卓越，抱絕偉之能力，莫非由於能造抽象概念之結果。」⁴² 近代中國面對帝國霸權的擴張與侵凌，知識分子從事啟蒙與革命，以改造國體與國民性，因而，備有相當的知識，心理進化到能有「概念思想」的境域，成為「能造概念的人」，就成為改造國體與國民性的重要基礎與實踐步驟；能構造概念也才能進一步了解、掌握具普遍性與公共性意義的

〈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1921年)，《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8冊，頁8。

³⁹ [俄] 蒲列哈諾夫 (Plekhanoff) 著、鄭超麟譯：〈辯證法與邏輯〉，《新青年》第10卷第4期，1924年8月1日，頁45。

⁴⁰ 〈邏輯漫談〉：〈「概念必含普通性。」〉耶魯撒冷著，徐彥之譯：〈邏輯漫談〉，《新潮》第1卷第2期，1919年2月1日，頁316。

⁴¹ 孟和：〈主義與他的制限〉，《現代評論》第5卷第109期，1927年1月8日，頁6。

⁴² 陶履恭：〈人類文化之起源·續前號〉，《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2月1日，頁59。

概念，而成其爲人，尤其是成其爲社會的一分子。

方珣（字東美，1899-1977）在討論柏格森生之哲學時，⁴³更認爲「知識是爲生命而存在的」，「正當創造的過程，生命遂把知識變做概念，來解決各種問題；更用來製造智慧的工具，以便適應後來生活的情況。」⁴⁴由於概念是一切理解的基礎，是人創造生命、製造智慧的工具，用來解決各種問題，以便適應未來生活。因而，馮友蘭認爲，概念在中國道德實踐方面十分重要，他列舉傳統中國爲什麼臣要忠於君，子要孝於父，乃取決於君父所代表之概念，他說：「因爲原來他們所須忠於，所須孝於的，並不是這些事實上的具體的君父，而乃是事實上具體的君父所代表之概念。」這是涉及「中國實踐道德之此方面之價值如何」。⁴⁵

陳獨秀（1879-1942）在二次革命失敗之後，認爲政治革命並無法救中國、建共和，重要的不在於政治革命，而是在於思想革命，而思想革命的根本在於「對於指導人類行爲一切名詞之解釋」，且有了「概念」，才不會「墮入迷途而不自覺」。他舉「革命」與「反革命」的例子說：「我們若是明白瞭解了革命與反革命的概念，對於任何黨派甚至於任何軍人每個革命的行動，都可以與之聯合；這種聯合純然是革命的聯合，爲推進革命」；如果不知「革命應以社會組織進化爲條件，不應以武力暴動爲特徵」，則「中國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評家往往墮入迷途」。⁴⁶可見概念建立在經驗、智識與能力、邏輯思維等，是思想革命的基礎，指導著人類的行爲，影響著未來的生活與社會。誠如早在1904年《教育通論·緒言》中即指出：「處萬象森羅，

⁴³ 關於柏格森的生平、生命哲學的內涵，以及生命哲學在近代思潮論辯中的影響，可參見張典魁：〈陳立夫《唯生論》與柏格森哲學關係之探討〉，《中正歷史學刊》第12期（2009年12月），頁157-194。

⁴⁴ 方珣：〈柏格森生之哲學〉，《少年中國》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頁5。

⁴⁵ 馮友蘭：〈名教之分析〉，《現代評論》二周年增刊，1927年1月1日，頁196。

⁴⁶ 陳獨秀：〈革命與反革命〉，《嚮導》第16期，1923年1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頁128。

庶物雜糅之世界中而從事學問者，不能以概念判斷、推理之效用，解其癥結，理想將何自而精？」故當「合舊觀念、新事實而抽出共同之點以構成概念，以養成心理上秩序之概念，而次第達完全之域。」⁴⁷

至於觀念，一如概念之義界，近代中國思想家也多挪用西方心理學與哲學家之說，認為觀念如同概念，乃奠基於經驗，除引蘇格蘭國之常識的直覺派謂：「即吾生得的觀念，備於生來普遍的必然的之觀念，決非由經驗而生」外，大多仍主張觀念乃由於經驗而來，如侯鴻鑒（筆名侯生，1872-1961）引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之說：「吾觀念皆由經驗而生者。吾心意最初之時，其表面如白紙然；迨種種觀念，由經驗而來，則如白紙之有書字。此經驗之淵源，由於感官之觸於外界之事物，覺知內界之狀態也。」又引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基於進化原則的調和之說：「無論由於經驗而生與否，然個人非由經驗而生，而吾人類之先祖，則有由代代之經驗而生者，吾受續吾先祖之經驗，次第有普遍的必然性。」並謂其「自可燭近世學者之缺點，而得其完全之論矣。」又引海尤姆承斯說主張「普遍的必然之觀念」，謂：「蓋觀念之由於經驗，吾之習慣，種種之觀念所由來，即生得的先天的觀念，亦盡由經驗而生也。」⁴⁸雖然近代思想家有時混用概念與觀念，且多主張觀念與概念均立基於經驗，但若大量閱讀近代中國使用觀念與概念二詞的相關論述，兩者的最大不同在於，觀念是孕胎於風俗、思想；感受於地理、歷史，不斷的漸漬浸潤、世代經驗傳承的一種慣性養成，而具普遍的必然性。⁴⁹如1903年〈教育私議〉一文中云：

夫社會之必當改良，與今日欲救危亡，當先從改良社會入手。

⁴⁷ 《教育通論》，〈緒言（續第7期）〉，《江蘇》第9、10期，1904年3月17日（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影印本），頁1588。

⁴⁸ 侯生：〈哲學概論〉（續前期），《江蘇》第7期，1903年10月20日，頁1244。

⁴⁹ 侯生：〈哲學概論〉（續前期），頁1244。

余又何說？要其用何術以致此？則此問題所急欲研究者也。大凡一種族或一國之人民，與他種族或他國之人民，其優劣不可知，要必有其特異之點。所謂性質，性質者，感之於地理，受之於歷史，本之於風俗，胎之於思想，積數千年來之觀念之習慣，漸漬浸潤於人人之腦中，以養成一種之慣性。社會者，又個人與個人相交接，而發現其性質之地也。故個人性質之高尚卑污，恆足以代表全社會之優劣；而社會之與國家，又為直接關係，是以一國盛衰興亡之故。⁵⁰

近代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革命、啟蒙行動，主要從改良社會開始，然社會又是個人與個人相交接，而具體呈現為個人感之於地理，受之於歷史，本之於風俗，胎之於思想，進而所養成的一種慣性觀念，其中標顯出個人性質的高尚卑污，而此正與全社會優劣，乃至於一國盛衰興亡息息相關。正因個人的性質，源於千年來觀念的浸潤與養成，因而，近代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革命、啟蒙行動，除注重以「字」思考而獲致抽象之概念外，也提出如何「合舊觀念、新事實而抽出共同之點以構成概念，以養成心理上秩序之概念，而次第達完全之域。」⁵¹但更多的是在討論觀念時，聚焦於情感、自覺心與認同等面向。如章太炎（1869-1936）謂：「吾人之心理，決不能無觀念之來集」，觀念「初必與作意相應，後必與思相應」；⁵²觀念是「聖凡之所以別」；⁵³

⁵⁰ 沼胡：〈教育私議〉，《江蘇》第5期，1903年8月23日，頁845。

⁵¹ 《教育通論》，〈緒言（續第7期）〉，《江蘇》第9、10期，1904年3月17日，頁1588。

⁵² 章太炎：〈與人書〉，《民報》第10號，1906年12月20日（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編纂委員會，1969年影印本），頁1543。

⁵³ 觀雲：〈養心用心論（續第70號）〉，《新民叢報》第3年第24號（原第72號），1906年1月9日（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影印本），頁23。

觀念尤其又來自於「感情之觸發」⁵⁴與「自覺心」。⁵⁵既本乎情感，則涉及認同，如云：「推究民人建國之觀念果何由而生？則但謂生於其共同心可耳。」「國家賴民人之自由而生息，民人以共同觀念建立國家，相合相助。」⁵⁶有共同心才有共同觀念，而這都生發於內在的覺知與情感，正如嚴復（1854-1921）譯述黑格爾（G. W. F. Hegel，1770-1831）唯心論云：

國者，民族之所成也。民族者何？一言語，同文字，乃至宗教禮俗與夫道德之觀念，靡有殊也，如是者謂之一民族。……國之合，以觀念之先合爲之，未有觀念不合而能強合其民者也。⁵⁷

言語文字及宗教禮俗與道德觀念相合，乃成其爲民族爲國家。如同〈憲政平議〉一文所云：「結合國民之智識，使之影響於實際之政治而發達其愛國心，其密接之關係與最近之觀念印入於國民之心腦中，自不覺天下國家之念油然而生也。」⁵⁸〈近世歐人之三大主義〉一文中亦提到：「既非同族，則何從而愛之；既無歷史之觀念，則何從而起感情，是中國所以終亡也夫。」⁵⁹由上可見要有相同觀念，才能凝聚情

⁵⁴ 侯生：「其直接也，感情之觸發表率純粹之觀念；其間接也，旨趣之存在媒介道德之精神。研究認識之問題在是此。」侯生：〈哲學概論〉，《江蘇》第3期，1903年6月25日，頁474。雨塵子：「……非吾民之祖先，與歷史無關係也。既非同族，則何從而愛之；既無歷史之觀念，則何從而起感情。是中國所以終亡也夫。」雨塵子：〈近世歐人之三大主義〉，《新民叢報》第28號，1903年3月27日，頁28。

⁵⁵ 飛生：〈國魂篇〉（續第3期），《浙江潮》第7期，1903年9月11日（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影印本），頁34。

⁵⁶ [德]伯倫知理：《國家論》卷1（接第17冊），《清議報》第18冊，1899年6月18日（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頁1160。

⁵⁷ 嚴復：〈述黑爾格唯心論〉，收於王栻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冊，214頁。

⁵⁸ 權量：〈憲政平議〉，《湖北學生界》第2期，1903年2月27日（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編纂委員會，1969年影印本），頁195。

⁵⁹ 雨塵子：〈近世歐人之三大主義〉，《新民叢報》第28號，1903年3月27日，頁28。

感，才能激發認同感，才能合為民族合為國家。如章士釗（筆名秋桐，1881-1973）云：「觀念乃國家之存於最大通象者也。」⁶⁰ 因此「觀念」扮演著國家民族生滅存亡的核心要義，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所共同關注的重要議題。

近代中國面臨西方霸權擴張與帝國侵凌，國家存亡實質又與觀念息息相關，《湖北學生界·敬告同鄉學生》云：

欲支柱之，補救之，恢張之，必非一二人之氣力所能勝。自不得不集群策群力，互相維持，以求達此觀念。觀念之強弱，中國之存亡即視以為差。……抱此觀念以身繫存亡絕續者，應不勝指屈。⁶¹

「觀念」之形成攸關乎群體認同之形成及國家存亡絕續之嚴峻課題，這樣的思想在當時一直蔓延著，因此可見1906年〈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指出：「政治革命之一觀念，與救國之一觀念，既連屬為一體而不可分也。」⁶² 而胡漢民（1879-1936）在1906年也指出「夫國家為人民心理的集合體，其結果受支配於心理法則」，若「諸人不志為國，亦無國家之觀念，則國猶不能生。於事實必待人志有國家而建之而後國家生。」⁶³ 正因國家為人民心理的集合體，若人民無國家之觀念，則無足以成其為國家。正因此，梁啟超認為個人主義是「今日中國膏肓之病」。當時不論漢人或滿人，若「大局之利害與己身之利害相反」，「則寧犧牲大局而顧本身」，「而絕非能有種族的觀念參與於其間也。」梁啟超認為「一身之利害」，是「由私的生

⁶⁰ 秋桐：〈復辟平議〉，《甲寅》第1卷第5號，1915年5月10日（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5年影印本），頁38。

⁶¹ 〈敬告同鄉學生〉，《湖北學生界》第5期，1903年5月27日，頁601。

⁶² 飲冰：〈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叢報》第4年第4號（原第76號），1906年3月8日，頁4-5。

⁶³ 胡漢民：〈述侯官嚴氏最近政見〉，《民報》第2號，1906年8月2日，頁250。

活而生其觀念者」；「一民族之利害，一國家之利害」，「則皆由公的生活而生其觀念者」。「淺識者流」，只「知有私的生活而不知有公的生活，故常不肯以一身之利害徇一民族一國家之利害」。若能知置重於一民族與國家之利害，則其識見「已能超越私的生活之範圍，經入於公的生活之範圍」，由於有「公」的觀念，自然顧及種族與國家之利害。⁶⁴

除了抵抗帝國霸權，存續家國所需觀念外，由觀念生發出新理想，以改造國體，改革社會，改良國民性，尤為關捩。如1906年〈中國教育問題之根本研究〉一文即從教育立論，認為：

夫以人之一身論，亦既有己之心理，己之耳目官骸，局於此社會，而有此等觀念，入於彼社會，又復生彼等觀念，或有移動其觀念，遂從此為文明進化之身。或偶移其觀念，不久即消滅，而旋復其舊社會之思想，遂永以沈淪。

文中認為觀念之轉變涉及文明之進化，但新觀念如果未深植，則容易消解，社會又復沈淪。因此，主張「目擊乎他國振興之現象，研考乎外人所成之著述，移為一種之觀念，積為一時之理想。」藉由教育，以改變觀念。作者認為「人之立於社會也，不外乎『人、我、物』三者之間，有以見其活動力之本能，與其思想力之發現。而其觀念之轉旋，或久或暫，悉根起於是焉。」無論是在所居之舊社會中，「無一新景物可以促其更變之決心」，或「及乎身入他社會」，「觀念之轉」，「偶有所變而仍復其舊者」，主要是因為「其於素居之社會，無甚空靈之腦想」，故須藉教育「善轉移人之腦想」，以「改良吾國某地人民之性質」，「驟高吾國某地人民之程度」。正因「教育事業，固息息與人民之心理精神為作用」，故藉由教育之功，「腦想變則性質即隨以更換」。是故觀念，既與「謀國民之進益」息息相關，又是「轉旋國勢

⁶⁴ 梁啟超：〈雜答某報（續第84號）〉，《新民叢報》第4年第13號（原第85號），1906年8月20日，頁4。

之原動力」。⁶⁵

除以教育改造國民觀念與素質外，舊傳統與新學相遇，又如何構造出新觀念，生發出新理想？蔣觀雲（1866-1929）云：「必於心理上，有兩個以上之觀念，聯合而構成一新觀念，而後所謂新理想者生。」他認為若僅有一個觀念，則新理想無從發生。若如舊傳統與新學相遇，而能聯合為一新觀念，則能生發一新理想。他舉例說：「若僅有君之一觀念，則君以外，無何等思想之可得。若既有一君之觀念，而又有一民權之觀念，又有一民智之觀念，於是三者聯合，而即可得一新理想。」蔣觀雲認為傳統僅有「君」之觀念，傳統觀念在與西方現代性相遭逢下，若「君」與「民權」、「民智」之觀念一聯合，則能生發出一新觀念，而「可得一新理想」。

因此，蔣觀雲接續討論觀念與觀念聯合之所以然與方式，他說：「觀念與觀念之聯合也，必先有一觀念之動，而後其餘之觀念，以連鎖而相繼而起。」觀念連鎖而相動之法，有二種：其一為「外動的，受動的」，即「新觀念之入來而動者，以一新有之觀念，喚起其舊有之觀念，由是而產出新觀念者」；其二為「內動的，自動的」，即「舊觀念之復起而動者，不待外來何等之感觸，而從舊日所有之觀念中，以此觀念，喚起彼之觀念，由是而產出新觀念者。」可知觀念與觀念連鎖相動的方式有二：一是文化母體在自我與他者的異置與共在的文化新框架下，傳統舊觀念受動於文化他者的新觀念，在共性與殊性的互文指涉與交錯互動下，透過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⁶⁶的過程，蛻變再生為新觀念；一是不待外來的刺激與發顯，僅從傳統舊觀念系統中，自主而內動的以此觀念喚起彼之觀念，進而產出新觀念。

蔣觀雲認為「吾人心理上之觀念無窮，觀念與觀念聯結之因緣無

⁶⁵ 以上參見知白：〈中國教育問題之根本研究〉，《新民叢報》第4年第21號（原第93號），1906年12月16日，頁6-9。

⁶⁶ 參見劉禾著，宋偉傑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修訂譯本）一書。

窮，從而吾人人類所產出之理想亦無窮。」而理想之構成，尤以後一種「外動的，受動的」為多。大體而言，蔣觀雲立基於進化論討論觀念之連鎖相動及新理想之構成，認為「兩異種合併，則一新種發生」。他舉例說：如以進化論之理言傳統之性善說，「不得謂之天賦之固有性，而當謂之進化之遺傳性」，如此一來就能生發出新觀念。然而，無論是「外動的，受動的」或「內動的，自動的」觀念之發起，又必來自於二個條件：「一生理之協助，如疾病疲倦，則一切之觀念，皆難發起是也；一意識之空虛。」觀念之發起，既起於生命之憂難，也生發於意識之空虛，這無疑是對顯於近代中國國族重重的顛危與憂患，為了一新傳統觀念以救國新民的治策。蔣觀雲認為，觀念之發起，須「空虛其意識」，故提出「養心用心之得其道」：「必先清淨其心，無逐於外緣，無紛於內擾」，「使意識之區域，洞洞然不儲一物」，而後「理境上之觀念」，才能「鳶飛魚躍，自呈其活潑之機」，「而觀念與觀念之融合」，乃不自知而生發一「新理想」。⁶⁷ 蔣觀雲以傳統儒家養心之論與宋明理學鳶飛魚躍之理境為根本，結合西學進化論，在呈顯觀念之連鎖相動的同時，主要仍為了在層層憂難的近代中國國族的巨大危機中開顯出時代新理境與新理想。

由此可知，近代中國在使用「觀念」與「概念」一詞之義界明顯有別。此外，觀念與概念之不同，又在於觀念之獨具排他性與競爭性，蔣觀雲言：「蓋吾人意識之區域，若有一種之觀念佔領，則他觀念無發生之機。若吾人有一憂慮之事，不能解釋，其時意識之區域，皆為此憂慮所充滿，而他觀念均在所擯拒之列。」⁶⁸ 梁啟超亦援引好友蔣觀雲「夫意識之區域，苟有一種之觀念佔領，則他觀念無從發生」⁶⁹之說，作為討論「意識」如何「虛而後能受」，以「廓清惡

⁶⁷ 觀雲：〈養心用心論〉，《新民叢報》第3年第21號（原第69號），1905年5月18日，頁4。

⁶⁸ 觀雲：〈養心用心論〉，頁3。

⁶⁹ 梁啟超：〈德育鑒〉（1905年），《飲冰室專集（三）》（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8年，頁54。

念」，「容納善念」。除了觀念深具排他性外，蔣觀雲更謂觀念與觀念之間具競爭性：「蓋觀念之與觀念，亦各各互試其競爭。當夫一個之觀念，獨佔優勝之位，則其餘之觀念，沈墜消退。」⁷⁰ 這些論述與概念通常指向於邏輯思維之思想法式判然有別。⁷¹

⁷⁰ 觀雲：〈養心用心論（續第70號）〉，《新民叢報》第3年第24號〈原第72號〉，1906年1月9日，頁23。

⁷¹ 當然，近代「概念」與「觀念」一詞之使用或意涵，仍多有混同或有先後次序指涉不一的現象，如侯生：「概念之由於觀念，觀念之由於知識，知識之必求認識。」李思純：「識是生於感覺（sensation）。由感覺而成知覺（perception），成觀念（idea），更成概念（conception），然後乃為知識。」瞿秋白：「經驗之後，還沒有定名，便只造成某種觀念；或者呢，現實世界還沒有被人認識明白之先，能因經驗而與人以某種概念。在這種時候，只有一種模糊的絕對的不可捉摸的意象——純粹理想上的一種界說。」其中或認為觀念是知覺系統發展為概念之前的津梁，或是經驗之後尚未定名的模糊體。另如章士釗（筆名秋桐）舉美國學者韋羅貝（Willoughby）《國家本性論（*The Nature of the State*）》曰：「觀念為凌空之想像，概念乃實驗之思維。前者起於玄，後者起於察。」清楚界定觀念是玄虛的想像；概念是實驗的思維。秋桐舉共和國體為例，觀念與概念之不同，在於「概念，則必徵諸實際，而有涉於特殊政體，歷史表而出之者焉，此其別也。」「觀念者，國無君政無共和一也。至此種觀念，印之政事，乃為何狀，則所謂『徵諸實際，而有涉於特殊政體。』概念之說也。」秋桐認為觀念與概念有所不同，然須「貫乎觀念、概念，以求其通」，方能掌握其「精神」。另如光益翻譯日本文學士深作安〈人格論〉云：「至此自識之成立，則本乎知性的統一與感性的統一之二者。所謂知性的統一者，吾人類集種種雜多事物之觀念，選拔其共通之點以為概念。概念者，概括錯雜之具體的觀念而得之抽象的觀念也。乃由此概括作用，而吾人頭腦中之具體的特殊的觀念，得為抽象的普泛的概念，精神界為之大加整頓而成一組織，由此所發之概念，於同一作用之下，更概括之而愈成抽象的。換言之。則使其內包愈少，外延漸廣，連結概念之各小系統而為一大系統者也。此知性的統一。以概念的統一，各為知性的統一。吾人之判斷思惟事物，專賴此統一之作用。而此統一，又因人而異。有秩序整然者，有雜亂無紀者。前者知的作用歸於精確，後者蓋猶未至是也，吾之頭腦生明暗之相異者亦基於此。是則可以知知性的統一，非知性極發達之後，斷難成立。」自識之成立，本乎知性的統一與感性的統一。其中知性的統一，概念的統一，是判斷思惟事物的主要憑藉。作者認為概念是概括錯雜之具體的觀念，選拔其共通之點，大加整頓以成一組織，而得之抽象的普泛的觀念，是為概念；在知性極發達之後，方能在內包愈少，外延漸廣之下，連結概念之各小系統而為一大系統，是為知性的統一。則作者或仍將觀念視為概括成概念前的錯雜的具體之觀念，如同〈邏輯漫談〉所言：「概念

一般而言，概念是思想與知識的前提，又是思維的塑形、思想的法式，更是啟迪思想、結構知識的基礎，是開啟思想、催化認知的知識結構化的一種圖式。近代中國面臨著劇烈的知識／思想轉型，隨順著西學東漸的文化新格局，因應著政治現實與社會歷史的巨大變遷，生產了許許多多的新概念以符應歷史現實與社會期待的轉變，在經歷了概念社會化的歷程，也漸累聚、積澱為理念型概念，成為各種意識形態下文化政治論戰的工具。因而，近代知識分子在改造國民性，進行思想啟蒙時，一方面強調國民須具備相當知識，心理進化到能有「概念思想」的境域，而成為「能造概念的人」，⁷² 才能融入於具可認知性與可溝通性的公共思想領域中，而成為社會國家的一分子。正如概念史學派所謂：概念附著於詞語之上；歷史沈積在概念之上。概念是集聚現實經驗與社會期待的多重涵義而高度濃縮、化約為關鍵詞而有別於一般詞語。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進行文化啟蒙與思想革命時，不約而同的也關注於「字」與「概念」的關係及人不自覺以「字」思考人的心靈活動。或許可說以「字」來認知、思考，是大眾文化的一種表徵。語言或認知的開始，不須語法，不須句式，不須命題，不須文脈；人類一切認知或知識的開始，乃至於大眾文化啟蒙之初，多緣起於以「字」

者，許多直覺判斷之究竟，而許多觀念相同之表德之總樞也。概念之保存藉助於符號，而符號常為一字。此字之真義，即此概念所含之表德，謂之內涵；概念表德所寓之物，謂之外延。」可知近代思想家或混同觀念與概念，視思維判斷所得之抽象的普泛的觀念為概念，但無論觀念與概念是否混同或有先後順序不一，但整體而言，二者仍大有區隔。分見侯生：〈哲學概論〉，《江蘇》第3期，1903年6月25日，頁477；李思純：〈信仰與宗教〉，《少年中國》第3卷第1期，1921年8月，頁64；瞿秋白：〈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新青年》第10卷第3期，1924年8月1日，頁13-14；秋桐：〈復辟平議〉，《甲寅》第1卷第5號，1915年5月10日，頁38；〔日〕文學士深作安著，光益譯：〈人格論〉，《新民叢報》第4年第23號（原第95號），1907年11月6日，頁94；耶魯撒冷著，徐彥之譯：〈邏輯漫談〉，《新潮》第1卷第2期，1919年2月1日，頁316。

⁷² 孟和：〈主義與他的制限〉，《現代評論》第5卷第109期，1927年1月，頁6。

認知、以「字」思考；正由於大眾文化世俗啟蒙與思想傳播以「字（詞彙）」為根基；藉由「字」之認知與事物之命名，開啟了事物與類屬的關係化框架，及人概念化認知世界的可能；從人藉由事物的比較與辨別，進而在「諸種複雜的性質和關係之一致體」⁷³中，概括出知識普遍的要素，共通的特徵或同一的性質，而成之為「概念」。因而，或可說概念是對多種事物共相的一種抽象化的思維圖式；⁷⁴概念的變化和擴大，反映了對世界的知識和認識的轉變與拓展。⁷⁵也因

⁷³ 1933年，沈志遠編《新哲學辭典》，其中「概念」條目：「客觀現實、客觀事物之反映于思維的形態，這形態是一致的和複雜性底結合體。事物、物體客觀存在著，它是諸種複雜的性質和關係之一致體，是客觀物質之具體的形式。當我們從物體底全部複雜性、從它的一切聯繫和關係上去認識此物體的時候，而這些複雜的形態；綜合為一致體，為整個的意念時，我們就獲得了事物之概念。」沈志遠編：《新哲學辭典》（北平：筆耕堂書店，1933年9月1版），頁259-261。

⁷⁴ 1903年，日本哲學家十時彌《論理學綱要》：「概念作用不外由比較而辨別異同，由抽象而總合同一之點，除去差異之點，以新構成一觀念之作用也。」〔日〕十時彌著，田吳炤譯：《論理學綱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年1版，1960年三聯書店重印本），頁6。汪榮寶、葉瀾編《新爾雅》：「從個物抽出其共同之點，而生起共同觀念者，謂之概念。」汪榮寶、葉瀾編：《新爾雅》（上海：上海明權社，東京井木活版所印，光緒二十九年（1903）6月1版），頁54。1911年，黃摩西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概念（conception）」：「就個個事物之觀念，抽象其共通要素，而概括之者。」黃摩西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上海：上海國學扶輪社，1911年5月1版），戊集，頁40-41。191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辭源》：「〔概念〕心理學名詞。就種種觀念，概括其相關類似者，而成一共同之概念也。」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辭源》，（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10月1版），辰集，頁164。1929年，陳綬蓀編《社會問題辭典》，「概念」條目：「哲學上指一切知識中普遍的要素稱為概念。這個普遍的要素，從個個事象上，是不問有意識的區別沒有。在心理學方向說來，概念不是有意的，是由無目的的活動，自然地構成的。例如在類似的諸概念中，同一性質，漸次強固地發達起來，相異點至被失去，終久只剩同一性質單獨的表現。」陳綬蓀編：《社會問題辭典》（上海：民智書局，1929年9月1版），頁829。鍾少華謂：概念有三種功能：（1）必有所指。（2）必有所造。（3）能有規範作用。見鍾少華：《中文概念史論》（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2年第1版），頁3。

⁷⁵ 1933年，沈志遠編《新哲學辭典》，其中「概念」條目：「概念是關於事物變化之具體的知識。所以它不會存在著不發生變化的；事物、它的聯繫

此，近代知識分子進行啟蒙與革命時，關注世俗大眾的心靈活動所習以為常的——以「字」去思考而獲致抽象之概念的語言行為或思想行動，因而，十分看重「字」與「概念」的關係，以及大眾文化中「抽象之概念」的思考方式與思想活動。

由於「字」承載了「概念」的內涵與外延，說文解「字」成了思想上正本清源的首要工作。可見近代知識分子深知「概念」多以「字」——「關鍵詞」呈顯，「字」——「關鍵詞」既承載也保存了概念，以「字」——「關鍵詞」表述的概念，涵攝、沈積了時代的重要命題；因而，或可說以「關鍵詞」表述的「概念」的演變，是社會歷史發展的表徵，也是時代文化變遷的縮影，更是改造國民性及推動社會歷史改變和發展的要素；正因概念的變遷，往往附著於語詞中而以「關鍵詞」呈現，因而「關鍵詞」——「概念」實質上指向於社會變遷與歷史發展、歷史現實與社會期待的總體縮影。也由於世俗大眾習慣以「字」思考，因而，近代知識分子依循著「字」——「概念」的軸線，連結著事物及其概念的互相關連與運動規律進行啟蒙與革命，以啟迪大眾的知識，使之進入概念思想的境域，能知概念，能造概念，以改革國民性與國體。

再者，任何一個文化世代的普遍或核心概念（基本或主導概念），往往是由比較而辨別異同，除去差異而總合相關類似或共通要素，概括以成共同體普遍的思維形態與知識取向。而且，具同一性質的諸概念，往往漸次強固地緊密連結而益加發達起來，展現出自我獨特的思維形態與概念的範疇作用。如1929年，陳綬蓀編《社會問題辭典》，「概念」條目云：

哲學上指一切知識中普遍的要素稱為概念。這個普遍的要素，從個個事象上，是不問有意識的區別沒有。在心理學方向說

和關係一發生變化，人類的實踐和人類的認識一發生變化時，事物底概念也就隨之而變化。」沈志遠編：《新哲學辭典》（北平：筆耕堂書店，1933年9月1版），頁259-261。

來，概念不是有意的，是由無目的的活動，自然地構成的。例如在類似的諸概念中，同一性質，漸次強固地發達起來，相異點至被失去，終久只剩同一性質單獨的表現。⁷⁶

陳綬蓀所謂具同一性質的類似諸概念，在漸次強固發達時，往往失卻相異點，展現出同一性質單獨的表現之說，與科塞雷克概念在抽象化和意識形態化後，往往從其多樣性（複數）向單一性（單數）過渡的「複合單數」之說，或有相互發明之妙或異曲同工之妙。⁷⁷然而，普遍或核心之概念（基本或主導概念），除呈現為共同體基本而重要的思維形態與知識基礎外，也因著認知活動的開展與具體的實踐行動，往往又能生發出共同觀念；在概念化認知世界的過程中，隨著經驗事實與價值關聯的沉積、附著與縮連、辯證，也漸而形構出理念型概念（ideal-typical concepts），並進而積澱、呈顯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觀念系統，支配著社會制度，指導著文化行動。亦即，從某方面而言，由於概念思維結合著經驗事實與價值關聯，因而藉由知識傳布與文化再製，漸而形構出具支配性或規範性的理念型概念，引導社會的整體思維傾向與價值觀念系統，尤其舊觀念與新事實彼此劇烈衝撞、頹頹之際，往往從中激盪、抽繹出具共同基礎或核心意義的理念型概念，從而形成一具心理秩序的新概念，從中引領出新思維與新觀念，此或如1904年《教育通論》所云：「合舊觀念、新事實而抽出共同之點以構成概念，以養成心理上秩序之概念，而次第達完全之域。」⁷⁸

但從另一方面而言，藉著知識的傳布與文化的再製，在概念的思維規範下，也可能進一步促成觀念的形塑。然而，觀念的形塑，更多呈顯為一種抽象的心理法則或涉及情感認同的共同心，這是一種在一定地理空間與歷史感知的文化框架下，緣之於感情觸發與內在覺知，

⁷⁶ 陳綬蓀編：《社會問題辭典》（上海：民智書局，1929年9月1版），頁829。

⁷⁷ 參見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頁100。

⁷⁸ 《教育通論》，〈緒言（續第7期）〉，《江蘇》第9、10期，1904年3月17日，頁1588。

蒙受於人文風土與思想啟迪，逐而漸漬浸潤為一種心理慣習並凝鑄為一種心靈圖像。因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為了救亡圖存，在改革社會，改造國體，改良國民性的具體作為上，除大量引介西方新文明與新概念，注重概念的知識功能與啟蒙作用外，在舊觀念與新現實劇烈衝撞與頹頹的過程中，藉由教育以改造國民觀念與素質外，又關注於舊傳統與新學相遇下如何構造出新觀念，生發出新理想，在傳統的現代性遭逢下，如何兼具「外動的，受動的」與「內動的，自動的」方式，在舊傳統與新學之間，在國族顛危與生命憂難之中，促成觀念與觀念連鎖相動，而生發出新觀念與新理想以救國新民。

正因概念作為抽象化理解世界的思維圖式，及社會經驗與世界認知的智性範疇，不啻構造了生活世界，是社會意義的重要載體，標顯出經驗事實與價值意義的關聯性，而以一种可認知與可溝通的公共思想，承載了社會上人與人知識經驗與價值意義的交流。然而，藉著經驗事實與價值關聯的沉積，不免也逐而形構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觀念系統，支配著社會制度，指導著文化行動。尤其在充滿高度裂縫的意識形態化概念／觀念系統中，概念／觀念與概念／觀念之間總是不斷碰撞、混雜、悖反著，而呈顯為一種相互交織、涵攝；彼此嫁接、抗拒的複雜互動過程；在社會文化轉型期中，概念／觀念的形成與變遷愈形劇烈的當下，原生的概念／觀念，更須依賴文化母體中重要的文化原料及文化交涉中引進、傳布的概念，在自我與他者共在、異置的新文化框架中，一方面不斷的與自我對話、疏通；一方面又與他者相互斡旋、調停，這是一段文化自指與命他的協商歷程與敘事行動。也因著文化交涉與協商的歷程，原生的概念／觀念，在與他者文化遇合、錯置、嫁接的同時，有進一步裂變、轉化、形塑的可能。

尤其，社會文化往往憑藉著一套價值意識形態化的觀念系統作為其正當性與合法性的根據與基礎，以維繫整體的常態性運作。意識形態化的觀念系統維繫著文化範式時期的價值信仰；然而，社會文化轉型期中，文化範式發生移位時，原意識形態化的觀念系統勢必有所調

整、變化、更替；從而發展出新的文化綱領與行動策略，以調動起巨大的社會動員、發揮著高度的文化認同的歷史能動力量與社會集體的情感凝聚作用，而有進一步文化再造的契機與轉機。亦即，在需要一種新的闡釋以置換價值代碼並取得意識形態合法化、正當化的當下，凝聚集體情感的認同機制一被啟動，必然帶來某種共同的文化行動。其中，鮮明體現在透過概念／觀念的再詮釋與再發明，所進行的文化自指與命他的文化協商與敘事行動。因而，或可說社會文化的遞嬗變遷，實質是在一系列觀念與事件、行動複雜互動的歷史過程中，呈顯為價值意識形態化觀念系統的解構、重構的文化再造歷程。然而，文化失範的革命時期，雖然某一思想體系解體了，但原範式時期組成價值意識形態化的基本觀念並不必然消失，組成思想體系要素的觀念仍以一種思想碎片⁷⁹的方式殘存著；基本觀念與觀念之間在變化、重組，甚或互植、錯生的同時，往往重新構連、綴合著文化母體中重要的思想碎片及他者文化的思想斷片，從而構築出一套符合新價值意識形態化的觀念系統，以作為發展新文化綱領與行動策略的巨大能動力量，藉以召喚、凝聚集體的情感認同。⁸⁰因而，或可說概念偏於共性，是思想的法式，是建立在智識能力與邏輯思維上，一種抽象化表述事物特性和關係，織構成各種意義網絡之觀看、理解世界的思維圖式，是一種作為可認知性與可思想性的知識基礎與思維樣態；觀念則偏於殊性，因意識形態、心理情感而不同，故獨具排他性與競爭性。

⁷⁹ 誠如金觀濤與劉青峰所言：「意識形態作為社會制度正當性基礎以及指導社會行動的綱領，是建立在一組普遍觀念之上的。」因而，「要理解革命意識形態解體後的思想形態，最可行的方法是考察那些組成思想體系的基本要素，即那些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意識形態建構和解構、仍然存在而且相對穩定的思想碎片。」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頁2。

⁸⁰ 參見鄭文惠：《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發刊詞〉，頁XII-XIII、鄭文惠：〈觀念史研究的文化視域〉，《史學月刊》，2012年第9期，頁15。

但另一方面，觀念意指蘊積於風土人文與歷史經驗，所構成的自我意識與社會價值，是一種作為可溝通性與可分享性的價值信仰，而指向於一種與事件、行動緊密關聯、彼此作用的社會巨大能動的心理系統與意識形態化的價值信仰。觀念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價值信仰，維持著社會關係形式的穩態性、存續性的發展，是社會得以正當性與合法性運轉的一種價值認同與實踐法則。⁸¹此外，概念在歷經社會化的過程中，因著具體的認知與實踐行動而逐漸與經驗事實與價值關聯契近而被認同時，這種具支配性或規範性的理念型概念，無疑已然成為一種引導社會的整體思維與價值系統的重要「觀念」。是故，近代知識分子一方面關注於如何啟蒙世俗大眾進入概念思想境域，以改造國民性與國體；一方面又在進化論的新視閫下，希望除了「內動的，自動的」召喚、革新傳統觀念外，更須「外動的，受動的」使異種合併，連鎖相動，而生發出新觀念，進而在巨大的國族危機與積弱的社會氣息中，開顯出時代新理境與新理想。

職是，近代中國概念／觀念一詞涵意雖有重疊，且概念一詞多轉植自西方，但概念作為一種思想法式的普遍共性，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從事思想啟蒙時，著重於從「知概念」達致「造概念」的思想境域，其中不免經過轉植——重製的再現過程。而觀念不同於概念，主要在於觀念獨具排他性與競爭性，而得能甄別出共性與殊性的差異。然而，無論是受動的或內動的觀念的連鎖相動或概念的連類相屬，在不對等的政治現實與文化流動框架下，由於佔據不同的發言位置與權力現實，不免使概念意義產生和轉換的文化迴路中，自生成一種彰顯／遮蔽的話語機制，從而形成支撐其背後理念或意識形態的在地性的概念／觀念體系。則近代中國觀念／概念體系之形構，雖部分來自於他者文化的思想斷片，但絕不等同於他者。因之，勢必要發展出一套適合分析中國的觀念史／概念史的研究取徑。

⁸¹ 參見鄭文惠：〈觀念史研究的文化視域〉，《史學月刊》，2012年第9期，頁15。

四、中國／東亞／全球： 自我與他者觀念域的文化交涉

近代漢字文化圈由於西學東漸，引進、傳布相當繁富多樣的西方物質文明與知識概念，從而揭開了近代中國漢語新語的生成⁸²及容受西方文明與新知識、新概念的歷史，也進而引發概念變遷與觀念形塑的社會歷史整體的變貌。因而，要勾勒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等思想樣態與演變過程，無疑須兼顧在地性的文化母體與區域性、全球化的視角，在中國／東亞／全球⁸³的文化框架中，關注於自我與他者觀念域的文化交涉，而不能自外於區域性、全球化的文化脈絡。一般而言，空間是體驗現實、觀看世界的基本形式與主要框架，既為人在建構自我主體提供了一種思維格局，也是自我主體感應於他者與回應於世界的重要架構。要研究「中國」，自不能忽略「東亞」命題與全球化的脈絡。

所謂「東亞」，既是一個地理的詞彙，也是一個政治的詞彙，⁸⁴同時更是一個虛假的詞彙，是一個不斷被想像、定義和發明、建構的概

⁸² 沈國威通過漢字文化圈近代詞彙體系形成的視角，將中日詞彙之間的借貸關係，放在「近代」的歷史脈絡中，闡述對現代漢語近代新詞的產生與定型。參見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版）。又謂：「近代關鍵字作為詞彙體系的一員，一方面蘊含著譯詞創造、普及、定型的問題；另一方面作為近代觀念的承載者，又反映了東亞接受西方文明的進程。」沈國威：《〈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書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7期（2010年9月），頁221。

⁸³ 如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第二屆FTP三校合作國際學術會議：「世界史／全球史視野中的東亞」（2012年12月17-18日），即分從「東亞的知識傳遞與國際秩序」、「從區域與全球的視角看前近代東亞史」、「方法論：世界史中的東亞」等角度討論。

⁸⁴ 據子安宣邦研究，「東亞」一詞作為一個文化概念最早出現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的日本；到了三〇年代，它變成了一個具有強烈政治意涵的詞彙，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帝國主義戰略提供理據。參見〔日〕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初版），頁8-15。

念。一者，東亞作為一個空間性的存在符碼，涵具了一定歷史的、國家的、民族的、地域的實體性。除表顯出東亞各話語主體心理構型、思維方式及觀念凝塑的過程；各話語主體在不同時空脈絡下製造地理、譯介文化所生產出的東亞性，也不斷形塑著東亞特定集體共在的思想觀念。因此，東亞作為一種表徵的心象空間，既是現實經驗與社會轉變的產物，也是話語主體行動與意向的中心，是一個融入文化意識與現實經驗的意向性結構空間，它被各話語主體不斷符碼化而成為有意義指涉的空間，而表顯為一個涵具價值意識形態化的空間範型。東亞作為各話語主體的關照場域，一個意識關涉之地，一個前近代歷史世界的總體縮影，既歷經特定時期類同的文化薰染與篩濾，也各自創造出東亞歷史的獨自結構與歷史法則，⁸⁵ 漸而積澱為一個複雜的象徵體系，也因而東亞遂能以一個文化地理空間範型而涵蘊著既類同又獨自的意義與經驗。

二者，東亞作為一個有意義區位的空間性存在，不同文化時空維度下，存在著空間之塑造、維繫和競逐關係。東亞作為一種空間性的實踐場域，是歷經不同時間脈絡下多重歷史過程的建構物，是在特定歷史情境中特殊社會變動過程中不斷定義與正名的文化再造物，眾多空間在其中相互重疊、彼此滲透，而呈顯出鮮明的交混與協商的文化軌跡。尤其東亞作為跨國國際間的重要交匯點、必然的折衝處，是一個勢必捲入世界多重力量交互作用下的權力競逐的產物。一系列文化操作與權力話語生產著東亞的社會關係，東亞也被種種的社會關係與國際形勢所支配及生產，而恆常處於變動不居與文化再造的歷程中。隨著近代以降全球化多方話語權的交互競逐，東亞作為一個獨特的地理空間範型與文化區域概念，無疑在世界多層權力角逐與多重力量作用下，輻湊、呈顯為一幅幅多變而流動的歷史圖像。東亞作為東亞各

⁸⁵ 西嶋定生認為皇帝制度、漢字、儒教與佛教等形成了也創造出東亞歷史的獨自結構與歷史法則。參見〔日〕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頁51-92。

國與全球權力關係的中介與體現，在歷史過程中不斷衍異出一場場權力的爭奪戲碼及文化建制的再造工程。無論是大眾媒介與國家權力及資本積累等抽象時空邏輯之上的東亞社會關係的結構化，或東亞作為區域的空間形態，隨著歷史演變而不斷重構與轉化其空間意義與社會關係，無疑道盡中國／東亞／全球在在地／區域／全球脈絡下，多元且複雜的權力作用與相互影響。⁸⁶因而，或可說東亞作為一個概念，述說了一則則內含眾多權力聲音與形式的文化故事，也呈顯為多重交錯的文化再造與歷史建構的敘事軌跡，使東亞作為一個在全球位置中區域性的空間形態，佔據了一個獨特的生產與實踐的位址，同時也局部生產、建構了世界圖景。

然而，東亞作為一個概念，雖涵具一定歷史的、國家的、民族的、地域的實體性，在時間性的結構歷程中，東亞以其獨特的文化地理構型而呈顯為特殊的風土人文與類同的歷史經驗，同時又展現為或多向、或重層而互為主體的共生又異置的面貌與內涵；東亞作為一個前近代以降開展而來的歷史世界，重要的行動、事件、制度、思想、觀念、信仰，經由跨文化、超國家的交流、傳播，早已錯綜複雜的呈顯為東亞各話語主體獨自的觀念價值的脈絡化轉換，而銘刻為一幀幀共織互構的東亞性之總體歷史圖像。若從區域史的觀點來看，東亞作為東亞各話語主體「共性」與「殊性」不斷交錯互動⁸⁷而呈顯為豐富而特殊的地域性經驗及全球各種力量匯聚、競逐的重要關係網絡，在東亞或全球的不對等關係結構中，又呈顯為一種跨文化、超國家的抽象時空邏輯之上的政治、社會、文化體。⁸⁸因而，或可說東亞既是實體又非實體；是真實的地理，又是想像的地理；一方面看似存在著

⁸⁶ 參見鄭文惠：〈從概念史到數位人文學：東亞觀念史研究的新視野與新方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51-52。

⁸⁷ 參見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臺大歷史學報》第43期（2009年6月），頁191。

⁸⁸ 參見鄭文惠：〈從概念史到數位人文學：東亞觀念史研究的新視野與新方法〉，頁52。

真實的政治、社會、文化體，但在多元文化主體與全球權力網絡的交流、互動、協商中，實質又盤根錯結為一政治、社會、文化的想像體。

因而，東亞作為一個區域的空間形態，是社會關係與文化秩序的體現；既展演出社會與存有的真實，也存在著歷史、地理的寓意。東亞以其獨特的文化地理空間構型與全球權力競逐關係而歷經不同而多元的賦義過程：東亞作為非處所非地方的空間性存在，既以獨特的文化地理空間型態積澱著特定共同體的記憶再現與文化認同，體現為自我與他者共存共構的秩序與關係，而呈顯為一個相互映襯，彼此照顯的秩序脈絡與關係型態。但空間本是一種權力施作於外的過程與結果，也是一種知識和論述生產的結果，充滿著各種意識形態競逐的痕跡。因而，東亞概念在作為東亞各話語主體及全球多元權力衝突、競逐的戰場空間，又獨具他者性與排他性。是故，東亞是一個複數的概念，存在著事實概念與規範概念，乃至於是以一個既真實又虛構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⁸⁹ 存在著，它是一個混雜、交匯的經驗空間，也是一個不同意識轉換的中介空間，是各種文化、權力穿越、構織而成的流動的疆界空間；它以一個異質空間的獨特性，非中心非邊緣的維繫著、翻轉著、顛覆著流動空間的社會關係與文化秩序。因而，或可說東亞作為一種概念方法、⁹⁰ 一種語言——論述位址、一個異質空間，是真實空間的倒轉、對立、照見與再現，而與真實空間恆常處在一個鏡像關係中，如同鏡花水月一般——水中月，鏡中象，看似不可湊泊，無由分說，但明鏡之中，光映萬象，不與體離，不與影合，非一非異，總多為一，寓一於多，非離非合，不即不離，萬物萬象畢現

⁸⁹ Foucault, Michel (1997 [1986]), "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 In Leach, Neil (ed). (1997), 350-358. "heterotopia" 或譯作「差異地點」、「異質地方」。

⁹⁰ 參見〔日〕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日〕子安宣邦著，趙京華譯：《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版）等書。

其中。一切跨文化、超國家多音複調的交流與對話，及文化越界旅行與國家聯盟、文化認同、區域整合等脈絡化轉換，在其中不斷折衝、協商、對抗、凝塑，述說出東亞作為近代以來全球化脈絡下的重要區域空間型態與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間範型，如何翻造為一則則獨特而意味深長的文化傳奇。

然而，「東亞」一詞在近代中國是作為在西方列強環伺之下與帝國主義⁹¹相連結、相伴生的一個概念，一個與西方霸權有潛在共謀關係的帝國主義地理學概念。因而，研究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宜將「東亞」作為一個概念與方法，除了耙梳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在東亞／全球視域下的意義建構歷程與脈絡化轉向外，「東亞」作為一種概念方法論或語言——論述位址，尤須重作反思並將「東亞」除魅化，以之作為「異質空間」位址，既再現真實空間，同時又是對抗性的空間配置，在抗拒性閱讀的基礎上，調動起話語論述的巨大能量。

尤其，近代中國居於全球的、多國的和非中心的交流網絡系統中，在地理大發現的全球化新視闕下，既受動於帝國霸權的文化擴張，也根源於自主性的救亡圖存與文化越界本然的流動性，而開啟了西學東漸及淺譯日本的文化新圖景。在容受西方文明與新知識、新概念的新歷史脈絡中，東亞漢字文化圈也更頻密的交流互動，進而引發近代中國劇烈的概念變遷與觀念形塑的歷史變貌。不同語言之間在進行文化翻譯的過程中，本涉及跨文化流動中自我與他者觀念域的文化交涉。有關詞彙、概念的轉換與容受，牽涉到文化母體內語言原有意義的基本制約，但不同文化場域中總體複雜的情境，不免也使文化翻譯在話語權的競逐上，呈現出更多的偶然性、隨機性，而產生意義滑

⁹¹ 子安宣邦認為「東亞」一詞，在日本是伴隨著軍國主義的發展而來，涵具了帝國主義爭霸思維。參見〔日〕子安宣邦著，陳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日〕子安宣邦著，趙京華譯：《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等書。

動、消解、更替的可能；當然，跨文化對話中涉及自我文化屬性與民族認同的重要概念／觀念，更常出現「不可譯性」。⁹² 概念／觀念在不同語言的翻譯和傳播的「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 過程中，與他者共在、異置而重新指認自我的同時，往往在文化母體的語料庫中擷取文化原料與思想資源，以一種心理防禦機制作為誤讀的根基，而不斷引起符號的移位，意義的滑動。因而，自我與他者觀念域的文化交涉，既是一個影響焦慮的文化誤讀過程，同時也是一種自我主體性的建構歷程，及一段製造話語權力與價值競技的歷史。

如「她」字作為關鍵詞研究，黃興濤提出「她」字的發明、論爭、早期傳播和最終流行，為中國近代的一個「文化史事件」。因為「它的誕生和流行，不僅是一種關係語法、詞彙的語言變革，也涉及社會性別意識問題，並成為新的現代性別觀念的重要載體」。此外，它還作為一個新的文學關鍵字，影響了現代中國文學新的主題書寫；它的傳播和早期社會化，不僅構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還會激發當時人對個人與國家關係乃至國家性質新的想像和認知，並在普遍用來代稱祖國的過程中通過與傳統孝親意識相結合，為現代中國人民族主義的強化提供了新的理性資源和情感動力。「她」字作為關鍵詞，是多種文化因素之間及其與社會之間彼此關係形態的文化史研究之新的對象，⁹³ 蘊涵了中國現代性問題和跨文化交涉的印記。可見在自我與他者觀念域的文化交涉過程中，「她」字作為由西方他者引入的新詞彙，一越界植入於近代中國，開啟了與原生文化母體的舊觀念及新時代文化脈絡連鎖互動出中國現代性的總體面貌。可

⁹² 方維規認為跨文化對話中常出現「不可譯性」，不同語言間缺乏相關對應詞，「更多的是緣於概念／觀念中特殊因素的增長。這種特殊性常被對話者當作認同形式，因為他們是以各自的文化屬性與所謂的不可譯性（民族特性）來界定自己的。」參見方維規：〈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關於定義和方法以及相關問題的若干思考〉，收於馮天瑜編：《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6。

⁹³ 參見黃興濤：《「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版）一書。

知「她」字作為概念史／觀念史研究的關鍵詞，在融合語言、文學、性別、概念／觀念和跨文化交流的多維視野與論述框架下，逼顯出一個轉型期中的關鍵詞，涉及了自我與他者觀念域文化交涉中關於語言變革、性別意識、文學再現、觀念轉型、社會變遷、文化行動等跨文化交流與越界的互動鏈，一個關鍵詞形成與演變的生命史，實質是一部文化變遷史。

又如戊戌時期康有為出於製造「變法」輿論的需要，在組織翻譯日文資料的過程中引入包括不少政法新名詞等近400個日本漢字名詞，與當時「改良」和「進化」、「進步」等帶有認識論傾向的新詞一併流通，無形之中也自然突顯了改革、變法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而與進化論取向的價值觀的傳播相得益彰。⁹⁴ 近代中國新文化的開啟，一方面在跨語際與跨文化交流中不斷積累他者的思想資源；一方面自我與他者也始終處於彼此爭奪話語權的競逐關係。康有為為了改革、變法，引進日本政法新名詞，並挪引西方進化論價值觀，作為變法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論據，康有為無疑是在自我與他者觀念域的文化交涉中，一方面藉由挪移他者文化以製造話語權力，一方面也藉以開顯改革、變法的主體性。正如其挪引西學進化之理，提出「尊碑」、「卑唐」之說，揭示書體、書風與時代風氣的深切關連，主要仍在於改革以開新。⁹⁵ 正因世變，康有為提倡碑學以開新變之局；「開新勝守舊」

⁹⁴ 參見黃興濤：〈新名詞的政治文化史——康有為與日本新名詞關係之研究〉，《新史學·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版）一文。

⁹⁵ 康有為：「人限於其俗，俗趨於變，天地江河，無日不變。……散文、篆法之解散，駢文隸體之成家，皆同時會，可以觀世變矣。」又云：「蓋天下世變既成，人心趨變，以變為主，則變者必勝，不變者必敗，而書亦其一端也。夫理無大小，因微知著，一線之點有限，而線之所引，億、兆、京、陔而無窮，豈不然哉！故有宋之世，蘇、米大變唐風，專主意態，此開新黨也。端明篤守唐法，此守舊黨也。而蘇、米盛而蔡亡，此亦開新勝守舊之證也。」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體變第四》、《廣藝舟雙楫·卑唐第十二》，分見華正書局編輯部：《歷代書法論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初版），頁722-723、758。

的「進化觀」成了「尊碑」、「卑唐」的理據，康有為暗用西方他者的進化觀念，製造了中國傳統「帖學」之外「碑體」書法典範之美的話語權力，然而，話語的深層意識無疑是立基於碑體與國體的一體觀，主要乃在藉由碑體魄力雄強、氣象渾穆⁹⁶等十美，隱喻改革、開新以救國的理念與主張。但，另一方面，卻也促使中國傳統書法由「帖學」而「碑學」美學範式的巨大移位。因而，無論是藝術主張或政治改革，近代知識分子如康有為等，多援引自我與他者文化交涉過程中文化他者的新詞彙或新概念作為思想資源，以重構文化母體的文化原料，藉而突顯改革、變法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在製造與競逐話語權力的同時，也進而開顯出自我主體性的建構歷程。

東亞各國現代化轉型以及現代概念的接受、流通與變遷、反芻，存在著高度的相似性，也有著獨自的發展結構，既分潤共享卻又彼此競逐。近代中國觀念／概念的現代化，是在全球化的話語體系中，和東亞現代性接軌（尤其是日本）的一個重要歷史過渡期或社會轉型期。因而，探究近代中國現代概念形成／觀念形塑，尤須關注不對等權力結構下，跨文化流動中異質文化間的商討與雜交及其脈絡化關係、文化接受主體的內在多重結構及能動實踐的可能性、文化傳播與接受的技術性意義，乃至於無形中所刻劃出日常生活的權力網絡與觀念系統等。此外，文化敘事上的模擬與轉換所開展出新的再現策略（representational strategies），促使特定共同體的情感、記憶與思想、觀念有了新的再造與重構的同時，勢必交織、錯雜著認同／反認同之話語權力與意識形態的競逐；再者，意識形態合法化、正當化的認同機制一被啟動，必然帶來某種「共同行動」的可能，而重新凝聚集體認同；然而，在需要一種新的闡釋以置換價值代碼並取得合法性與正當性的當下，一定程度上也隱匿了某種文化暴力，但也開啟了新的道德意識形態的建構與認同。這是一個觀念與事件、行動複雜互動的歷

⁹⁶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十六宗第十六》，頁770。

史過程。⁹⁷ 近代以降，隨著全球化的文化流動與地理越界，概念的流布與觀念的形塑，層羅密織為跨文化和跨語言流動與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探究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有必要立基於中國／東亞／全球的思想框架與方法視域下，以中國為核心，進行「中國／東亞／全球」由「節點」到「網絡」的比較概念史的研究，方能有效掌握自我與他者觀念域的文化交涉的總體面貌，勾勒出中國乃至於東亞現代概念／觀念形成與變遷的歷史圖像。

則知，研究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若置於一種概念史的比較視野中，整體察考在中國／東亞／全球的文化框架中，近代中國轉型期在東亞／全球跨文化流動中相關知識／概念之譯介，以勾勒出中國在東亞／全球語境中概念引進和傳布的路徑及移植和闡釋的方式，以確認不同歷史經驗在時間軸線中的先後關係及共時性事件在不同空間跨語際流動中與歷史性結構之間的文化地理學上的關聯性，則在中國／東亞／全球的比較概念史的視域下，考察中國自我與他者觀念域的文化交涉，或能較整全而深入的勾勒出中國近代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的歷史圖像。誠如溝口雄三所言，中國的近代不可否認地是以中國固有的傳統為基體，⁹⁸ 不應該將中國近代僅看作是「西方衝擊」的承受者；「中體」的「西體」化，只是「舊中國」的蛻化過程。⁹⁹ 討論中國的近代化，始終仍應置於「中國／東亞／全球」文化交涉的歷史框架中，辨明他者如何深嵌於中國文化母體的自我意識中，致使蛻變再生。因而，探究東亞／全球視野中的中國近代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不僅需要一種「比較概念史」的新視野，同時也須整體而深入地掌握中國的文化母體或歷史基體。

⁹⁷ 參見鄭文惠：〈觀念史研究的文化視域〉，《史學月刊》2012年第9期，頁18。

⁹⁸ 溝口雄三所謂「歷史基體」論，即「中國有中國獨自的歷史現實和歷史展開，這體現於長期持續的種種現象在不同時代裡的緩慢變化上，所以中國的近代應該從近代與前近代的關聯來把握。」參見〔日〕溝口雄三著，孫軍悅譯：《作為方法的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第1版），頁111。

⁹⁹ 〔日〕溝口雄三著，孫軍悅譯：《作為方法的中國》，頁18-19。

五、互文／隱喻：觀念／概念的跨文化考掘學

再者，概念史／觀念史研究，理當是一門跨文類、跨學科、跨領域¹⁰⁰的文化考掘學，提供越界研究的可能方案與基本圖式。概念／觀念以其獨具的抽象性，除詞彙外，往往也憑藉著文學、圖像、影像、儀式等形象隱喻而具形。在人類語言與圖像雙代碼交流體系中，概念作為承載現實經驗與社會期待多重涵義的集聚體或顯影劑，不只附著、沈積於關鍵詞語，也一部分隱匿於作為多元知識表徵形式之一的圖像等，而語言與圖像世界又建立在隱喻基礎上，如汪精衛云：「夫民族之表見於外者，為特有之徽識。圖騰社會【此從嚴譯，社會通詮日本譯為『徽章社會』】視此最重。至於今世，亦莫能廢。民族之徽識，常與民族之精神相維繫，望之而民族觀念油然而生。」¹⁰¹其中分明指陳出民族徽識，是維繫民族精神，凝聚民族情感，彰顯民族觀念的重要媒介物，兼涵了情感指向、觀念表徵等文化隱喻。

無論菁英或常民的世界觀大多由諸多概念／觀念組構而成，而概念／觀念寓棲於詞彙、文學、圖像、影像、儀式等再現空間中；詞彙、文學、圖像、影像、儀式等，作為概念／觀念再現的重要美學載體，無疑成為文化內部結構及文化重組和轉化之際的重要組成部分；各類形象修辭與文化符碼，構築出一門複雜的文化象徵學，屢屢在文化事件或歷史行動上，乃至於跨文化交涉中，扮演著重要而具意指性

¹⁰⁰ 觀念史研究之初，已然指向一條跨領域的研究路徑。諾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曾言：學者各自在他們的秘室裡彼此孤立地極其仔細地研究已然被裂隔為文學、藝術、科學、神學、教育、社會思想等學科，致使原共屬於西方思想體系的有機體，被強行分割、肢解而無復生命，故而，倡言唯有「觀念史」才能使之起死為生。參見諾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1873-1962）著，張傳有、高秉江譯：《存在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德國概念史學派，科塞雷克在1955年創辦的《概念史文庫》（*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也是朝向跨學科、跨文化、跨國界的歷史語義學的研究。

¹⁰¹ 汪精衛：〈民族的國民（未完）〉，《民報》第1號，1905年11月26日，頁29-30。

的關鍵性環節。¹⁰² 因而，要理解概念／觀念與社會、事件、行動的互動鏈結與關係脈絡，尤須透過以概念／觀念為核心的跨領域、跨學科、跨文類的越界研究與文本互文性的脈絡化分析，方能掌握概念／觀念的流通、反芻、轉化的社會化過程與文化交涉歷程中，如何以一種詞彙、文學、圖像、影像、儀式等美學修辭作為多重中介，進行複雜而動態的隱喻與象徵，以作為凝聚情感，引領行動的概念工具與思想資源。因而，除詞彙的歷史語義學分析外，文學、圖像、影像、儀式等形象修辭與概念隱喻的文化考掘學和概念傳播、觀念變遷研究，宜緊密建立起聯繫。

詞彙、文學、圖像、影像、儀式等形象修辭，作為一種概念／觀念再現的美學載體，向來包孕著複雜而隱微的隱喻與象徵；概念／觀念與詞彙、文學、圖像、影像、儀式等所建立的多層次隱喻與象徵關係，往往憑藉著一套套形象美學修辭建立彼此的依存關係與轉喻機制；一個個概念／觀念，藉由相關形象、情節之文化敘事，進而使概念／觀念轉換為社會行動，或演繹為文化事件。亦即，除詞彙外，文學、圖像、影像、儀式等在表徵事件、再現概念／觀念的抒情／敘事修辭策略中，往往通過一系列的意象／情節，構造事件與概念／觀念、集體主體與社會現實的關係；文學、圖像、影像、儀式等文本空間中抒情／敘事的話語，實質承載著事件、行動與概念／觀念互動的文化鏈結，表徵著集體主體與社會現實的構建關係。

如中國傳統經典性的桃花源文本作為自由生命與理想邦國的一種隱喻與象徵，經由累代文學藝術家不斷擬形賦意，而拓植、深化了桃花源文化美學的意涵。歷代文人面對政治變局、社會離亂、人性崩解等總體異化，多透過桃花源的意指實踐歷程，將異化的世界轉變為一窺視的客體，藉由文化生產的意指過程，建制出理想的生命圖式與社會圖式，用以彰顯自我主體與文化認同，並抗衡政治宰制與社

¹⁰² 參見鄭文惠：〈觀念史研究的文化視域〉，頁15。

會壓迫。因而，「桃花源」不僅是文人精神家園終極原型的示現，也是「應然世界」典型的「文化圖像」；「桃花源」作為生命回歸的「精神家園」與「理想邦國」應該如何示現的一種人生構築／歷史假設，是一個兼具生命追尋與文化認同的象徵符碼。累代恆久不輟的樂園想像與桃源圖式的文化建制，實質涉及不同世代、不同的人對理想化之「應然生命」與「應然世界」的追尋與建構，既是人內在本性的基本欲求，也同時是觀看世界、面向現實轉而逆轉現實、超離世俗的一種特殊美學視域；桃花源意象／情節的隱喻修辭結構與桃花源歷史地理學知識系譜的文化建制，承載了異化世界中人對「應然生命」與「應然世界」的理想投射與觀念再造。

如元代在文化世變的歷史現實中，桃花源往往被轉喻為太平／非戰的空間，也是遺民不忘故國的隱遯空間。桃花源仿如神話樂園世界，是元代文人社群冀望回歸文化本根的隱喻，同時也兼涵作為抗斥政治實體空間位址的一種象徵符碼。至於桃花源文本結構或指向於全真教式之仙隱及家鄉化之漁隱型態，乃至於作為情色歡娛而失落的指涉空間，不免成了元代文人社群去政治化的一種超政治的隱逸情懷及面向現實困境而尋求生命超越的深層隱喻。近代中國隨著地理大發現、新知新學的產製及烏托邦的譯介，知識菁英面對西方文化霸權的無限擴張及變動劇烈的政治時局，往往挪移古典桃花源文本，並嫁接、編譯、轉化、改寫華胥國、黃金世界、極樂世界、大同、仙鄉等神話樂園文化譜系及西方烏托邦的文化敘事，而再現出新的桃花源／烏托邦的敘事結構，桃花源／烏托邦的追尋與建構，成為晚清知識菁英面向現實社會與政治時局的一種批判視角與隱喻象徵。在對顯、批判現實的混亂無序與匱缺破敗的同時，又往外求索，迎向未來，桃花源／烏托邦由虛構空間翻轉為實指的空間，主人公主動介入桃花源／烏托邦的他者空間中，並以新知新學新科技興邦建國，進而塑造現代化國家，使社會走向新文明境界；晚清桃花源／烏托邦的敘事結構，實質開啟了一種新的向前看的「未來」時間觀，富涵著主體改造與拯

救靈魂，及興利除弊與救國興民之啟蒙與革命的價值底蘊。則近代中國桃花源／烏托邦之樂園敘事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文化文本，無疑既是一種社會矛盾與政治危機的象徵性再現，也是一種尋求社會變革與改造國家的欲望投射與表徵形式。

歷代桃花源話語體式的建構與接受，往往是在文化世變下所再現的一種新的文化想像，而呈現為新的價值意識形態化的轉義結構。一個新的歷史文化語境，往往促成不同的敘事／抒情範式的移位，是共同體意識形態的象徵性再現。正因桃花源是中國文人對理想生命與理想邦國價值外化的一種象徵與隱喻，因而，桃花源的接受史始終涵具了一種生成性、建構性的話語形構力量。¹⁰³ 尤其在近代中國面對西方文化擴張主義的凌逼，及地理大發現、新知新學的產製、新科技與新文明的引入等，桃花源的意指實踐，承載著集體主體與社會現實「應然」的理想構建，不免進而促使傳統桃花源敘事／抒情範式的移位。

又如「瓜」作為一個文化象徵的美學符碼，《詩經·大雅·綿》提供了「縣縣瓜瓞」的原型意象，隱喻周太王王業根基之奠定，世世代代賡續而不絕；在宗法社會中世俗常民以之作為傳宗接代，子孫繁衍、世代綿延的吉祥寓意，而涵具了生命繁盛、代代傳衍的文化隱喻。遭逢世變的遺民如宋末元初錢選，運用一種反圖繪法的復古美學筆法畫〈秋瓜圖〉（圖一），以作為文人社群遭逢世變與亡國的現實隱喻，突顯出文人失時、無依的困境及生存權利被剝奪的屈辱與文化失根的創傷，甚至透過詩／書／畫¹⁰⁴ 互文性的美學建制空間踐行

¹⁰³ 參見鄭文惠：《文學與圖像的文化美學——想像共同體的樂園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初版），頁182-196、鄭文惠：〈樂園想像與文化認同——桃花源及其接受史〉，收於成功大學中文系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初版），頁147-182。另，有關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可參見顏健富：《編譯／變異：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年7月）。

¹⁰⁴ 畫上題詩：「金流石爍汗如雨，削入冰盤氣似秋。寫向小窗醒醉目，東陵閑說故秦侯。」圖收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一：錢選：〈秋瓜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反同化的文化行動。〈秋瓜圖〉拒絕南宋以來立體勾勒花果的方式，及一切可引發任何感官刺激的視覺化經驗，將圖像統合在同一色系之中。畫家以平面化的幽暗色調與冷逸筆致，鋪陳出荒涼無依的秋瓜蔓長於雜草橫生的艱困環境中，畫面上秋瓜顯然既失了時宜，生存權利又被掠奪。透過詩／畫互文性的美學修辭策略，畫家指涉出夏瓜、秋瓜與東陵瓜，及醒／醉兩組修辭符碼，也再現出夏瓜、秋瓜、東陵瓜、錢選複合為一的圖像，以傳述文化世變下遺民的現實困境、文化

鄉愁及表述反同化的文化訴求。¹⁰⁵ 詩中夏瓜既及時又用於世的寓意及召平東陵瓜亡國隱逸，不認同新政權的象徵，¹⁰⁶ 顯然與畫面中的秋瓜共構成一組悖逆相反又複合為一的修辭策略；「醒醉目」則挪用了屈原〈漁父〉醉／醒的寓意；畫家作畫之前醉眼惺忪，隱喻了文化世變下文人日常淪落而無法超越的困境，醉眼經由招魂儀式般的繪畫行動，召喚出文化傳統中東陵瓜的美好記憶，而甦醒了沈淪的內在意志，也希望藉由述說東陵故秦侯的故事，喚醒更多遭逢文化失根，不用於世的人文社群，進行反同化的文化行動。這是在傳統「言志——知音」抒情美學視域下所生發的連鎖效應與漣漪作用，是一種堅持恢復文化傳統的文化建制行動。可見畫幅空間中藉由詩／書／畫的互文性美學結構，秋瓜、夏瓜、東陵瓜是三位一體的相互指涉物，現實世界中的夏瓜與秋瓜與傳統世界中的東陵瓜，藉由時空錯置的美學修辭策略，涵具了亡國隱逸的象徵內涵及反同化的文化訴求。

《詩經》縣縣瓜瓞的原型意象，已然隱喻了一種世世代代生命綿延傳承的意涵；遭逢世變的遺民，則結合《詩經》縣縣瓜瓞的形象與東陵瓜亡國隱逸的美學託喻，作為反同化的文化訴求，瓜的形象與象徵，早已成為常民與遺民內置的感覺結構。近代中國因著西方文化擴張主義下帝國霸權的侵凌，「瓜」的形象圖式與政治隱喻，又再演繹為「瓜分圖」，而與國族存亡與權力不對等觀念共構為一個整體而不能分割的隱喻關係與象徵維度。¹⁰⁷ 但它依然疊置並傳衍了國家與宗族生滅存亡的文化隱喻，是家國淪亡的一種觀念化的視覺再現。如1899年梁啟超〈瓜分危言〉，將「瓜分」與「沉睡」概念錯疊為一，

¹⁰⁵ 參見鄭文惠：〈遺民的生命圖像與文化鄉愁——錢選詩／畫互文修辭的時空結構與對話主題〉，《政大中文學報》第6期（2006年12月），頁166-167。

¹⁰⁶ 《史記》：「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參見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版），卷五三，〈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頁2017。

¹⁰⁷ 參見鄭文惠：〈觀念史研究的文化視域〉，頁17。

沉重的剖析「西人之議瓜分中國」，「深沈審慎，處心積慮」數十年，以至「鐵路礦務內治種種之權利，盡歸他國之手。」而中國則既「頑睡不醒」，又「囂然自安自大」；即使「一二有識者，唇舌俱敝，血淚俱盡，曾不足以醒群夢於萬一。」¹⁰⁸

同一年，1899年7月19日謝纘泰（1872-1937）在香港將所理解中國與列強的關係，繪為〈時局全圖〉（“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圖二），在以熊（俄國）、鬥牛犬（英國）、青蛙（法國）、老



圖二：謝纘泰（Tse Tsan-tai, 1872-1937）：
〈時局全圖〉（“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香港：不著出版地，1899年7月。

¹⁰⁸ 梁啟超：〈瓜分危言〉（1899），梁啟超著，底本據林志鈞編：《飲冰室文集》（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頁19-43。

鷹（美國）、蛇（德國）等動物象徵列強諸國，各自控制部分中國領土的政治諷刺畫中，傳遞了中國與列強間主動權與權力不對等的政治現狀。¹⁰⁹圖左上角詩云：「沉沉酣睡我中華，那知愛國即愛家。國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即是在家國同構道德共同體的文化框架下，挪轉傳統「瓜」形象的內置感覺結構為帝國強權瓜分中國國土的隱喻；分裂的「瓜」，已然變轉為近代中國國族在列強蠶食鯨吞下生命存有的轉喻性符碼；「瓜」作為一種觀念化的視覺再現，與晚清時局、西方霸權構連為一個國族存亡的文化隱喻。由「睡」而「醒」，雖仍挪用屈原「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文化事典，但置放於帝國強權瓜分中國國土的晚清時局中，由「睡」而「醒」的情態與「瓜」的形象，共構為一組連類譬喻的隱喻關係，調動起傳統以來世代傳衍、反同化的內置感覺結構，成為「國民」「愛國即愛家」的集體認同，從而激揚民族情緒以救國的文化號召行動。¹¹⁰

數年後，馬星馳1908年於《神州日報》畫〈外人以鐵道侵略中國之危象〉（圖三），¹¹¹以瓜藤連結關內、外的鐵道作為中國命脈的隱喻，而象徵著滿清老大帝國的老翁則酣眠沉睡於瓜果上，任由英、俄、日等帝國虎視眈眈，準備瓜分中國鐵路權，圖像全然將梁啟超〈瓜分危言〉中「瓜分」與「沉睡」概念，予以極直觀而形象化的再現而出。畫面上瓜果象徵中國領土，瓜藤作為中國命脈的隱喻，象徵連結關內、外的鐵道；圖像上俄國、日本和英國已然控制中國東清鐵道、南滿鐵道及滬杭甬；最強大的帝國——英國手持長刀，準備下手分瓜、一旁俄國蓄勢挑釁、日本虎視眈眈，而面對外國勢力竄謀中國鐵路權一事，中國人及滿清政府不僅不加抵禦，更如畫面上一象徵滿

¹⁰⁹ 參見〔德〕魯道夫 G. 瓦格納（Rudolf G. Wagner）著，吳億偉譯：〈中國的「睡」與「醒」：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14-39。

¹¹⁰ 參見鄭文惠：〈觀念史研究的文化視域〉，頁17。

¹¹¹ 馬星馳：〈外人以鐵道侵略中國之危象〉，《神州日報》，1908年4月14日。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圖三：馬星馳：〈外人以鐵道侵略中國之危象〉，
《神州日報》，1908年4月14日。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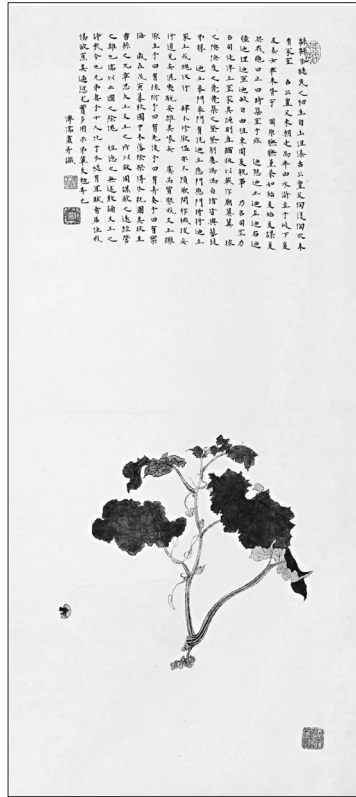
清老大帝國的老翁酣眠沉睡於瓜果上，而任由人瓜分鐵路權與領土。一如錢病鶴（1879-1944）1912年於《民權畫報》上畫〈瓜戲〉¹¹²（圖四），畫面上外國人戲耍、扭挫、抽拔藤蔓，攀爬到瓜上，再現出象徵著中國領土與國家母體的「瓜」被凌虐、侵吞之狀，而中國官員和各階層人民則兀自在瓜下酣睡不覺。由此可見，近代中國「瓜」圖，多挪用作為帝國霸權瓜分中國領土之隱喻，瓜果破分，已然是近代中國領土被瓜分無狀及家國破亡的常見的隱喻符碼。

¹¹² 錢病鶴（1879-1944）：〈瓜戲〉，《民權畫報》，1912年。見《清代報刊圖畫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年）。



圖四：錢病鶴（1879-1944）：〈瓜戲〉，
《民權畫報》，1912年。（《清代報刊圖畫集成》，北
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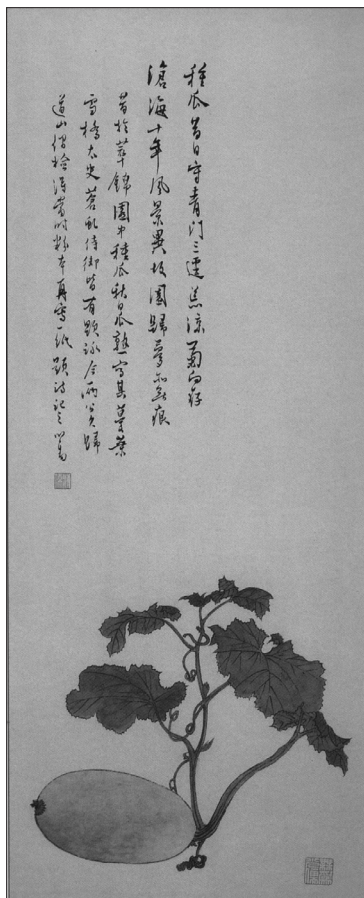
再者，如清室皇裔溥心畬於盧溝橋事變隔年畫〈縣縣瓜瓞〉（圖五），圖上除以精謹的楷書錄上《詩經·大雅·縣》九章外，又題識云：「歲在戊寅（1938）暮秋，園中木落，除架得瓜。既圖其狀，且書〈縣〉之九章。思大王文王之所以啟周，謀猷之遠，經營之難也。儒以亡國之餘，愧祖德之無述，敢誦文王之詩哉？今也兄弟妻子十人，比于瓜瓞，有宜賦者。居恆戒惕，欲寡其過愆，尤實多用，示弟輩交勉耳已。」一九三八年北京城已淪入日軍之手，溥心畬作為遜清貴胄，值國破家亡之際，又面臨著自萃錦園搬遷他處的現實困境，乃寫北京萃錦園親手栽植的瓜，題識藉周朝建國維艱，儆醒弟輩祖先創業不易，當深自戒惕寡過。在帝國霸權侵凌的現實政治之下，畫幅空間中以直挺的瓜藤及傾側翻轉的瓜葉為構圖主軸，橫向的瓜果白如敷



圖五：溥心畬：〈縣縣瓜瓞圖〉，私人收藏

粉，幾乎隱形不見，畫家一方面畫瓜果隱如不見，雖可能是瓜熟白如敷粉的現實形象圖式，但更有可能的是用以隱喻家國淪亡，象徵主體存有虛空化的匱缺；故而，一方面標顯出即使國家淪亡，依然瓜瓞縣縣，瓜藤與瓜葉仍自主的向上茁長。

四九年溥心畬隨著國民政府流寓臺灣，渡海來臺十年後，因偶然之間檢得昔日在北京恭王府萃錦園畫所植瓜果的粉本，憶及原畫上題詠者雪橋太史（楊鍾羲，1865-1940）、蒼虬侍御（陳曾壽，1878-1949）二人已久逝；流寓臺灣十年，滄海桑田，興感之餘乃成



圖六：溥心畬：〈瓜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瓜圖〉(圖六)。¹¹³ 溥心畬五〇年代末期，流寓臺灣十年後，重畫〈瓜圖〉，畫面結構一如〈縣縣瓜瓞〉圖，但〈瓜圖〉不再畫瓜果隱如不見，且瓜果不再只是瓜果，瓜果鮮明的成了根脈，滋長著瓜藤與瓜葉儼如一株開枝散葉的直挺昂揚的樹苗，瓜果成了孕育一切的文化本根的隱喻，也象徵著文化根脈之屹立不搖。溥心畬作為世變下的遺民／

¹¹³ 題畫詩：「種瓜昔日守青門，三逕荒涼菊向存。滄海十年風景異，故園歸夢亦無痕。」

流亡主體，題畫詩化用東陵瓜、蔣詡三徑猶荒¹¹⁴向為遺民內置感覺結構的熟典，在詩／書／畫互文性的美學空間中，寓託身體空間雖位移海外異域，亡國隱逸的心志永不變改外，以瓜果為根脈，滋長出一株直挺的樹苗，這當是對中國近代以來帝國瓜分中國概念的翻轉，唯有主體挺立，方不致於被侵凌。因而，「瓜」作為觀念再現的形象修辭，溥心畬用以表述文化鄉愁的同時，也是作為遺民／流亡主體應然生命及文化根脈的轉喻性美學形象。

以上可知，「瓜」作為形象隱喻與觀念再現的美學修辭，除世俗常民子孫綿延的宗族象徵外，往往也是遺民文化鄉愁的象徵代碼，及表述生命存有與應然世界的轉喻性符號。¹¹⁵在近代中國又與國族存亡與權力不對等觀念共構為一個整體不能分割的隱喻關係與象徵維度。近代中國將女體／國體互作比擬，將傳統破瓜的女體隱喻¹¹⁶和被瓜分、佔領的國體兩相連結，因而，由「瓜」到「瓜分」的觀念再現，無疑是一系列由女體到國體、由宗族到國族的文化隱喻學。

文學／圖像等形象修辭，作為一種觀念再現的美學載體，往往藉由一套形象美學修辭與情節敘事結構建立彼此的依存關係與轉喻機制；觀念與文學／圖像所建立的多層次隱喻關係，關乎彼此之間轉喻的邏輯力度、情感張力；為了召喚集體記憶與凝聚共體情感，文學／圖像作為觀念再現，大多從具寓意性的文化知識倉庫裡，採擷已然意識形態化的觀念或內置為感覺結構的文化原料，因應著不同的文化脈絡，再造新的文化隱喻工程，以調動起社會行動與文化再造的巨大心

¹¹⁴ 東漢趙岐：《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隱於杜陵。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參見趙岐：《三輔決錄》（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1版），卷一，頁15。

¹¹⁵ 參見鄭文惠：〈後遺民時間／地理政治學：溥心畬臺灣風物之文化敘事〉，《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13期（2013年2月），頁9；鄭文惠：〈遺民的生命圖像與文化鄉愁——錢選詩／畫互文修辭的時空結構與對話主題〉，頁163。

¹¹⁶ 如馮夢龍《警世通言》卷三二：「那杜十娘自十三歲破瓜，今一十九歲，七年之內不知歷過了多少公子王孫，一個個情迷意蕩，破家蕩產而不惜。」明天啟四年刻本，頁312。

理動能。¹¹⁷ 由傳統至近代中國「瓜」的形象與隱喻，儼然成了一門視覺政治學。

因之，概念史／觀念史研究，宜作為一門跨領域、跨學科、跨文類的文化考掘學，透過不同文類、不同領域之互文性分析，考察在文化重組和轉化之際，概念／觀念的流通、反芻、轉化的社會化過程中，如何以一種詞彙、圖像、文學等美學修辭作為多重中介，進行複雜而動態的概念化隱喻與象徵，而此不啻開顯出一條越界研究的概念史／觀念史方法與路徑。

六、「觀念·事件·行動」互動的大歷史結構： 由「語言」到「數位人文」的轉向

概念／觀念在現代社會轉型中的生成意義與脈絡化轉向，往往透過異文化跨語際的交涉過程，而呈顯為高度嫁接、交混、駁斥、裂變等極為錯綜複雜的多維度的動態結構。由於概念／觀念成為一種具可溝通性與可分享性的公共思想或凝塑為意識形態化價值信仰的社會化過程，通常是以相對應於概念／觀念的「關鍵詞」與「關鍵詞叢」作為話語表述的核心，尤其近代中國揭開了一個新語新詞快速生成，及以一種選汰機制重鑄舊詞以因應著劇烈變動的新時代，在傳統文化與異文化跨語際實踐的動態過程中，「關鍵詞」實質承載了時代轉變的重要命題，是時代文化轉型的顯影劑。因而聚焦於關鍵詞的研究，容或是掌握在一定時空框架下概念／觀念形成與演變及脈絡化轉向較為有效的方法之一，這也是德國概念史研究的著力處。然而，何謂關鍵詞？傳統研究者只能憑藉著知識經驗、學問功力及學術敏銳度而主觀認定；再者，以關鍵詞為核心所指涉的概念不可能以單一的概念存在著，觀念也因與其他觀念彼此競爭或排他機制存在著，傳統人文研究

¹¹⁷ 參見鄭文惠：〈觀念史研究的文化視域〉，頁17。

耗時費力的蒐集、閱讀文獻，又主觀的進行歸納與詮釋，長期以來始終被批評研究不具客觀性、不具開放性、不具可檢驗性。但因應著數位時代知識微縮革命的推進，人文學者面對的再也不是定量文獻了，面對巨量文獻，除了要有傳統的學術功底外，如何鎖定重要文獻中的重要訊息，以數位技術方法輔助進行歸納與演繹，成了一個嚴峻的學術新課題與新考驗。因而，面對各式各類的學術資料庫與巨量的數位文獻，以數位文本作為研究的文獻類型，在「人文研究思維」結合「數位推論技術」下所形成的「數位人文思維邏輯」，或許可以有效解決關鍵詞的客觀認定及概念／觀念群的研究，這無疑開啟概念史／觀念史研究一種新方法與新視野，也帶來概念史／觀念史由「語言」轉向「數位人文」¹¹⁸ 研究的新範式。

一般而言，概念／觀念的形成與變遷，是構成文化事件與社會行動展開的重要環節，也是在文化事件與社會行動衝擊下一次又一次演變而成。因而，金觀濤、劉青峰認為，概念史／觀念史研究並不能只停留在歷史事件如何制約關鍵詞意義變遷的微觀分析上，而應著重於「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¹¹⁹ 與「觀念」間的互動，將一個個關鍵詞意義分析拼合起來以得到歷史的宏觀圖象，方能總結出社會行動是如何反作用於支配其發生觀念的一般法則。然而，如何將一個個關鍵詞意義分析拼合起來以得到歷史的宏觀圖象？若以傳統研究方式，無非須累積眾多學者持續非常長期的研究，方能從各研究拼圖中拼合出一些歷史圖像的碎片；但在大數據（Big Data）時代，隨著大量的數據庫的開發與建置，及數據挖掘（data mining）的「數據庫方法」（database method）¹²⁰ 與數位人文學的開展，結合「人文思維」與「數

¹¹⁸ 參見金觀濤：〈數位人文研究的理論基礎〉，收於項潔編：《數位人文研究的新視野：基礎與想像》（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頁45-62。

¹¹⁹ 參見金觀濤、劉青峰：〈歷史研究的客觀性：論觀念史圖像中的真實〉，《新史學》第18卷第1期（2007年3月），頁87-119。

¹²⁰ 所謂「數據庫方法」是電腦處理數據的新方法，它有助於研究者思考如何

位技術」及統計分析，或能有效勾勒出觀念／事件／行動互動的大歷史結構。

金觀濤和劉青峰先生 1997-2007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因著近現代中國政治思想轉型研究上的需求，建立了 1830-1930 年間包含中國近現代報刊、雜誌、傳教士和西方著作中譯本以及各種文集，共 1.2 億字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¹²¹在研究型數據庫的基礎上，利用「數據庫方法」進行觀念史研究，探究「社會」、「共和」、「權利」、「個人」、「經濟」、「科學」、「革命」等重大現代觀念形成以及相應近百個重要術語的演變，藉以勾勒觀念的形成與演變軌跡及與社會事件互動的進程。¹²¹將數據挖掘方法系統運用到觀念史的研究中，實質為觀念史研究帶來新的視野與觀點，也帶來新的方法和技術，大大改變了傳統研究的方式與方法。然而，這僅止於指涉於觀

從數據庫中提取數據，並通過分析發現研究對象之間易被忽略或是難以憑人力覺察的關係。透過「數據庫方法」可以從專業數據庫中分析某一觀念相對應的一個或一組關鍵詞及其年代分布頻度，並通過文本解讀去分析該關鍵詞的不同意義類型及歷時性演化過程，進而挖掘和尋找出一般人工很難完成，名目繁多事項間的相關性分析，從而開啟新思路，發現觀念演變軌跡，勾勒出新觀念的發生和演變與社會事件互動的進程。而「數據庫方法」的觀察焦點，是以表達某一觀念的關鍵詞例句為中心，用以揭示觀念與社會行動之間的相互作用，特別是社會行動如何反作用於觀念；尤其是當關鍵詞研究範圍從對應著概念的關鍵詞，擴大到包括事件、對象、社會行動、行動主體以及各類事物的關鍵詞時，對關鍵詞的分析就會擴大到以歷史為中心的整個人文學；而隨著數據庫方法在各類關鍵詞研究的應用，也推動了數位人文學的興起。關於「數據庫方法」與「數位人文學」之關係，可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 5-6；金觀濤、劉青峰：〈隱藏在關鍵詞中的歷史世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1 期（2011 年 12 月），頁 53、75-81；金觀濤、劉青峰：〈數位人文研究的理論基礎〉、〈觀念史研究與數據庫的建立和應用〉，收於項潔編：《數位人文研究的新視野：基礎與想像》。

¹²¹ 金觀濤、劉青峰兩人自 1997 年起，建立了「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專業數據庫（1830-1930）」，並對諸如「科學」、「民主」、「權利」、「社會」、「革命」、「個人」等最重要的 10 組現代觀念，以及與此相關的近 100 個政治術語進行歷史語義之分析，進而發現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觀念的形成大都經歷了選擇性吸收、學習、創造性重構三個階段。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 6-21。

念的一個個關鍵詞的研究，且以詞頻（frequency）判斷關鍵詞的重要性，仍存在著指標性不足的疑慮。因而，概念史／觀念史的數位人文研究主要在於如何客觀判準關鍵詞？以關鍵詞指涉的概念／觀念，如何進行由「節點」到「網絡」的概念／觀念群的數位人文研究，藉以重構多重概念／觀念共現的語意網，呈現彼此互動、競合的關係與作用或相互排斥、誤讀的方式與機制？

有關概念史／觀念史的數位人文研究，或許可由漢語構詞方式進行數位技術方法的協作：如近代中國有許多以「～界」為後詞綴的重要觀念，如國界、女界、境界、詩界、小說界等；以「新～」為前詞綴的重要觀念，如新語、新民、新青年、新文學、新文藝等，以「～主義」為後詞綴的重要觀念，如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等，均可藉由「前後詞綴」概念史／觀念史的數位人文方法，快速擷取巨量數位文本中的關鍵詞訊息，俾利人文學者在原有的知識積累與學術功力下，更傾全力於數據與文獻解讀上，以獲致相關概念／觀念形成與演變的軌跡，以掌握概念／觀念變遷的大歷史結構。

這些議題或多或少學者均已觸及，¹²² 但若以「主義」觀為分析對象，傳統學者多能聚焦於中國近代「主義」觀念內涵為何？發展趨勢為何？然而，若以「後詞綴」數位人文方法，觀察「主義」觀念的形成、發展與變化的過程，則可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1.2 億字數位文本中，快速篩出共五萬一千多筆「主義」詞條資料，並可汰除不相關資料達92%，快速鎖定重點且必要

¹²² 如章清：〈「界」的虛與實：略論漢語新詞與晚清社會的演進〉，《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7（2011年3月），頁55-76、羅志田：〈新的崇拜：西潮衝擊下近代中國思想權勢的轉移〉，《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二文，是以傳統方法進行研究，研究者須大量閱讀與蒐集相關史料，積累多年後方能進行有效論述。但目前數位人文技術中的「前後詞綴」研究方法，已可藉由電腦快速擷取大量數位史料中的關鍵詞訊息，人文學者可省去過濾與蒐集史料的時間，並立即在原有知識積累與學術功力下，更快地直接進入分析研究，推進學術上的進程與研究上的突破。

的文獻，進一步再進行「～主義」的類型擷取，可快速給定近代中國百年間共出現1,680種不同名稱的主義，並可逐一排序，得出每年使用「主義」的類型與數目、各種主義在每年的使用頻度、任一「主義」的歷時發展趨勢與過程、特殊高峰期相關「主義」的關係和演變脈絡、「主義」的脈絡化轉向與時代語境，如此一來，當能宏觀的掌握「主義」這一關鍵詞所指涉的近代中國的重要概念／觀念的形成與演變軌跡，及其在近代中國產生的影響。

如「主義」一詞從1896年開始發展，至1899年出現大量主義類型，1903年達致第一高峰，出現324種主義；1906年後主義種類開始減少，1911-1912年降至波谷；之後又大量出現，於1919年達致第二波高峰。又如1903年出現次數最多的「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及「社會主義」，從中即可進一步分析三者之間的指涉關係，及其作為取代傳統儒家意識形態，成為新的意識形態之意義。¹²³然而，這僅是一個初步的數位人文觀察，主要描繪出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1.2億字數位文本中共出現1,680種不同名稱的主義，若是未來能獲得世界各角落所保存的繁富的近代文獻檔案，則

¹²³ 〈「主義」的數位人文研究〉一文所使用的數位程式：1. 定位及縮小要處理的文字範圍（reduce and locate the target-area size）。2. 利用後序遞增法產生候選清單，並進行人機互動比對在合併相同詞彙過程中，將四個字元的「主義」數量從五萬一千多筆減少至三千八百多筆，減少92%的數量。然而這種依照字數遞增的逐字切割方法無法保證取得有意義的「主義」，因此還需要佐以加總及統計方法，在確定為有意義詞彙的過程中，將出現次數在十次以上的四個字元的「主義」數量從三千八百多筆減少至三百八十多筆，減少90%的數量。在這兩個步驟過程後，共減少了99%的數量。此外，再進一步藉由統計的數字歸納出更多有意義的「主義」詞組（patterns）。3. 重複利用清單提取更多潛在的詞組。透過上述的程式後，便能取得「主義種類」的總數量。最後進行統計與分析，將透過以上程式所獲得的數據，依年代分布進行排序，以求得統計每年使用的「主義種類」的數量及各種主義在每年的使用頻度。在此一階段，則透過程式統計文獻資料，以獲得研究所需之數據。因此，數位科技的引入，提供研究者過濾大量且複雜的文獻、並提供數據統計之結果，有助於研究者分析與解釋。相關研究可參見詹筌亦、王乃昕：〈「主義」的數位人文研究〉，收入項潔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頁219-245。

當能給出更多不同的主義類型，觀察相關發展的現象與脈絡。不過，上述研究所給定的數據，即可實質客觀地驗證王汎森先生所主張五四之後「主義」風靡知識界，更有大量的「主義化」的現象；即使胡適在1919年提出「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¹²⁴的論點，仍無法抑制「主義」的勢頭。¹²⁵「後詞綴」數位人文方法若再配合關鍵詞叢¹²⁶的多重共現的共現計算模組，則又可進一步更深入分析特殊高峰期相關「主義」的關係與「主義」關鍵詞叢的多重共現網絡與意義，進而逼顯出複雜、立體的時代語境。

以關鍵詞叢的多重共現計算模組，重新研究舊有的議題，往往能有所突破，如日本學者川島眞先生認為中國主權觀念起於1897年膠州灣成為租界地時的瓜分危機，¹²⁷但據數位人文研究結果顯示：「中國」與「主權」作為關鍵詞叢的共現關係，在1897年次數極少，即使是共現，也並未僅聚焦在瓜分危機之上。¹²⁸此外，藉由關鍵詞叢

¹²⁴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年），第1集，卷2，頁343-364。

¹²⁵ 王汎森：〈「主義」與「學問」——一九二〇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分裂〉，收於劉翠溶主編：《四分溪論學集：慶祝李遠哲先生七十壽辰》（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6年），上冊，頁123-170。

¹²⁶ 「關鍵詞叢」概念，是以研究者所關注之概念／觀念出發，尋找表達該概念／觀念共現（co-occurrence）頻率高的相關詞彙，如以「主權」觀念為例，其共現頻率高的詞彙有「和約」、「自主之權」、「權力」……等。而以「主權」觀念為主軸，旁及諸多「共現詞彙」之一套語彙結構，即可稱之為「主權」的「關鍵詞叢」。關鍵詞叢數位研究法之程式：1. 選取主要關鍵詞例句；2. 建立研究範疇關鍵詞庫；3. 進行關鍵詞庫定義；4. 運算程式得出觀念類型分佈趨勢圖；5. 分析觀念類型趨勢圖。一個概念／觀念應是由更多關鍵詞所共同形構出來的，因此要能掌握概念／觀念的真實歷史發展，必然得使用關鍵詞叢之方法來進行歷史發展脈絡的描繪。換言之，以往是以單一關鍵詞來代表概念／觀念，如今透過數位方法之協助，則可更進一步以「關鍵詞叢」來指涉一個概念／觀念。參見邱偉雲：〈關鍵詞叢與文本意義挖掘的嘗試：以《清季外交史料》為例〉，收於項潔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頁159-188。

¹²⁷ [日] 川島眞：《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

¹²⁸ 邱偉雲：〈關鍵詞叢與文本意義挖掘的嘗試：以《清季外交史料》為例〉，

擷詞技術，還可觀察概念／觀念如何從時代思潮中逐漸凝縮成「短語」，最終形成「關鍵詞」的詞化過程，¹²⁹ 勾勒指涉出重要概念／觀念關鍵詞出現前的醞釀語境，進行「前概念／觀念」的數位人文研究，以勾勒概念／觀念從無到有的突變與湧現的發生軌跡。也可以事件為核心，擷取共現的觀念詞叢，著重詞彙的語境與共現的詞叢，進行「共現」詞頻之分析，藉以觀察在事件發展過程中，不同概念／觀念在事件發展史上，如何受事件的影響而產生變化的過程。如透過《清季外交史料》中「華工事件」的歷時性發展，除可形構成當時官方對於「華工」認知的轉移過程，也可進一步觀察隨著「華工」事件認知焦點的轉移，「華人」觀念如何逐漸隨之形成的脈絡，從中可勾勒出華工事件與華人意識互動與演進的趨勢。經過數位人文研究，得知：其一，「華人」觀念起源於「華工」事件；其二，華工事件引起中國對華商的重視，而清廷對華商觀念的改變，也促成了華人意識的興起；其三，美國的「排華」從限禁「華工」擴大到整個「華人」；其四，華工事件引發清廷保護海外華人的心態，而呈現出從保護「華工」到保護「華人」的行動過程。¹³⁰ 由上可見，雖然看似僅進行關鍵詞與關鍵詞叢的數位人文研究，然而這其實涉及並牽連起「觀念·事件·行動」互動的大歷史結構。可見以數位人文技術方法研究關鍵詞，當可使關鍵詞的研究，不僅只是歷史語義學的研究；關鍵詞的數

頁 159-188。

¹²⁹ 參見邱偉雲：〈關鍵詞叢與文本意義挖掘的嘗試：以《清季外交史料》為例〉，頁 159-188。「詞化」過程，參見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6-7。

¹³⁰ 《清季外交史料》中有關「華工」關鍵詞之文獻共 109 篇，總字數為 118,899 字，文中主要以“PAT-Tree”數位擷詞技術與共現詞頻分析法為數位輔助程式，透過數位程式，可協助研究者快速在所研究的龐大文本中，切割出眾多的待選詞，再由研究者確定重要關鍵詞後，進一步將關鍵詞兩兩配對成共現詞組，觀察各共現詞組的共現頻度及歷時性分布。相關研究參見金觀濤、邱偉雲、劉昭麟：〈「共現」詞頻分析及其運用——以「華人」觀念起源為例〉，收於項潔等主編：《數位人文要義：尋找類型與軌跡》（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年），頁 141-170。

位人文研究，實質與「觀念·事件·行動」密切相關，或可在揭示概念／觀念群語意網的範疇集群的同時，掌握概念／觀念與事件的關係，及概念／觀念轉化為社會行動、社會行動又改變概念／觀念之互動鏈下的大歷史結構。

再者，為了使詞頻判斷關鍵詞與關鍵詞叢更具客觀性與指標性，除利用“PAT-Tree”¹³¹技術外，也可根據“Zipf-Mandelbrot”模型計算出的理論曲線，統計出「準詞彙」的偏離值，從而得知最大偏離段及確定關鍵詞，藉此一則或可解決主觀判斷關鍵詞時因人而異的爭議及減少人工篩選關鍵詞的負擔；二則也能更加客觀準確地篩選出關鍵詞，以細緻地觀察思想變化，及反映在文本上的語言現象。如金觀濤先生等人，運用齊夫定律（Zipf's Law）的偏離值計算，確定《新青年》數位文本的關鍵詞與關鍵詞叢，大約可得知：一、偏離值大小能夠代表詞的關鍵性；二、偏離值與觀念確立的關係；三、關鍵詞詞數與觀念確立的關係；進一步可掌握關鍵詞與觀念變遷的關係，及關鍵詞的偏離值與詞數能部分反映文本的思想變化，也能反映時代特性。

大體而言，該文透過數位人文技術的協助，得出唯有透過數位人文視野方能觀察出的新問題與新解答。首先，《新青年》文本中的思想變化，反映了近代中國知識群體從新文化運動到接受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形塑過程。第一卷具有最大偏離值的關鍵詞是「國家」、「政府」；第二卷則是「青年」，實質反映出歐戰的慘烈與陰影及戰後談判時，中國作為戰勝國竟無法取回山東半島的權益，使中國人對於轉植於西方的「國家」及「政府」觀念所蘊含的普遍性質產生鬆

¹³¹ “PAT Tree”技術內容，可參見 McCreight, Edward M. (1976), “A Space-Economical Suffix Tree Construction Algorithm”, *Journal of the ACM* 23 (2): 262-272. Lee-Feng Chien. 1999. “PAT-tree-based adaptive keyphrase extraction for intelligent Chinese information retriev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35(4), 501-521；劉昭麟、金觀濤、劉青峰、邱偉雲、姚育松：〈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於中文史學文獻分析之初步應用〉，收於項潔主編：《數位人文要義：尋找類型與軌跡》，頁61-82。

動、瓦解、破滅，轉而走向關注青年、女性等個人自覺的道路。其次，從關鍵詞數量變化中，第一卷至第五卷出現的關鍵詞，自然偏離值偏低，關鍵詞偏少，是尚未有核心價值的「無共識觀念期」；第六卷至第八卷（1919-1921），是社會主義引入取得反響的時期，而具有最大偏離值的關鍵詞，除「社會」、「他們」、「我們」外，出現大量屬於無產階級革命意識形態的關鍵詞，如「勞動」、「工人」、「資本」。雖然關鍵詞偏多，明顯的觀念變多，但仍未一致地使用相同意識形態的概念語言，可稱為「思想討論期」；第九卷（1921.5.1-1922.7.1）明顯發生大轉折，1921年正是中國共產黨正式建立的時間點，《新青年》從此成為中共的機關報，因而，第九卷至第十一卷具有最大偏離值的關鍵詞分別是「主義」、「階級」、「主義」等意識形態用語，且偏離值極高，具「非常關鍵的關鍵詞」的特質，可視為「意識形態確立期」，¹³²印證了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確立與深植。在確立關鍵詞與觀念變遷的關係的同時，不僅可勾勒了報刊立場及思潮轉型的歷時性軌跡，也證明了王汎森先生認為措辭與概念數量的升降可以反應一個時代心理特質的主張，¹³³更可進一步開展出新說。可見結合數位人文方法與統計偏離值計算，既可分析人力所無法處理的巨量資料與文本的複雜脈絡，也提供一種以齊夫定律偏離值計算研究人文課題的實驗性探索。

此外，近現代中國對西方新文明與新概念／觀念的紀錄與指稱，主要呈現在「音譯詞」上，因此唯有更具體而全面的掌握音譯詞，才能掌握近現代中國對西方新文明與新概念的容受與傳播狀況及新觀念

¹³² 參見金觀濤、梁穎誼、姚育松、劉昭麟：〈統計偏離值分析於人文研究上的應用——以《新青年》為例〉，《第四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2012年11月29-30日）。

¹³³ 參見王汎森：〈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收於許紀霖、宋宏編：《現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242。

形成的過程。但是，研究者在浩繁的卷帙中以人工檢閱擷取音譯詞，不僅耗時費工，也難免有所遺漏，若是藉由數位技術協助研究者自動判別音譯詞並自動給出，只要找出規則式候選詞過濾方法，並採取漢文文獻差集過濾法，排除顯非音譯詞之候選詞，以進行漢文文獻詞彙自動擷取，¹³⁴ 相信未來在漢文文獻之外來語音譯詞擷取方法更為精進，對近現代相關研究當有大的進展與突破。

以數位人文方法，勾勒近代中國概念／觀念形成與演變的脈絡及其大歷史結構，洵不同於傳統的研究方法與視野。如研究近代中國「國家」、「世界」觀念的形成與演變，除前概念／觀念、事件與概念／觀念互動數位人文方法外，若引入時空分析（time-space analysis）、社群計算（social calculation）、引文分析（quotation analysis）等數位人文方法，當能更好地掌握近代「國家」、「世界」觀念形成與演變的軌跡。時空分析方面，透過數位技術來擬構歷時性的概念／觀念發展時間軸與地域空間對概念／觀念形成與演變的影響，當能更全方位的從時空向度，掌握概念／觀念形成與演變軌跡的橫縱發展；在社群計算方面，透過某一時期行動者的人際社會網絡計算，勾勒並掌握行動者社群與交友關係，及概念／觀念接受與傳播狀態、行動群體間共同概念／觀念的形成與演變的軌跡、行動者在社會上的互動網絡，當有助益於學術系譜的擬構。此外，又可透過區辨某一概念／觀念的「原文」與「引文」的不同屬性與內蘊，藉以觀察概念／觀念在「引文」中的再現意義，及如何進行概念／觀念的「再生產」，則可掌握不同時代命題下，被引用的概念／觀念「如何」、「為何」作為「以言行事」¹³⁵ 而被記憶召喚，尤其概念／觀念在跨語

¹³⁴ 參見王昱鈞、呂翊瑄、蔡宗翰、劉青峰、金觀濤、劉昭麟：〈漢文文獻之外來語音譯詞擷取方法〉，「第四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2012年11月29-30日），頁247-263；劉昭麟、金觀濤、劉青峰、邱偉雲、姚育松：〈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於中文史學文獻分析之初步應用〉，頁61-82。

¹³⁵ 參見〔英〕昆廷·斯金納著，任軍鋒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思

際、跨文化交流過程中彼此互動、牽制、移植、嫁接等複雜而流動的關係，而其中又回應哪些時代命題，凡此當對概念／觀念史研究帶來助益。

張灝先生曾指出在轉型時代中，中國知識分子都企圖在新的世界秩序框架下，重新建構自我定位，因此必須重新勾勒新的認知地圖。¹³⁶ 近代中國無論是國家、民族、社會，乃至於個人，無疑都陷入萬國的、全球的、非中心的新型「世界」空間網絡系統中，唯有透過新的認知繪圖（cognitive mapping）方式重新認識、進入世界，「廓繪」（figuration）¹³⁷ 出身處於新的世界空間系統中的位置，方能界定自我及集體主體的定向空間，並描摹出自我及集體主體與其真實存在狀況的想像性關係，進而洞悉由國家民族到世界國際的政治困局，才能再次為個人及社會文化政治建構新的前景，並勾勒出新的國家社會改造藍圖。因而，觀察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對於「國家／世界」觀念的詮釋與建構，以及「國家／世界」觀念如何伴隨著時代命題與文化思潮而轉移，當可勾勒出近代中國「國家／世界」觀念的形成與演變軌跡——一種新型空間認知圖繪行動與歷史事件及國家、世界觀念互動的過程與軌跡。如果在人文思維與數位技術的基礎上，再導入統計學敘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探討數據集的集中趨勢（central tendency）以及分散度（dispersion），亦即在同一群體中，測量各個體的某種特性的共同存在趨勢及各個體的差異或離中程度的量數，並進一步提昇“network”技術中的關係計算效能，著重於由「節點」到「網絡」的概念／觀念多重共現的關係性的挖掘，不僅如以基因演算般使數位技術方法自動給出核心關鍵詞成爲一種可能，且以人類基因

想史研究》第1輯（2006年7月），頁132、141、159、162。

¹³⁶ 參見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頁51-52。

¹³⁷ 有關「認知繪圖」一說，參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著，吳美真譯：《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

的排列思維，來作為勾連每一文本、行動者思想觀念核心關鍵詞的線索，以掌握巨量語料中更具指標性意義的關鍵詞，也可掌握關鍵詞所指涉於概念／觀念的發展軌跡與論述結構、多重概念／觀念群共現的語意網絡關係，及行動社群在概念／觀念接受與傳播及互動的類神經網絡與關係。藉由語言基因圖譜的持續挖掘及多重共現計算模組等結合人文思維與數位技術、統計理論的新方法，相信概念史／觀念史的數位人文研究，除可補足傳統研究之不具客觀性之外，又可檢驗、修正舊說，並探索傳統人力所不及之課題，進而開展出新說。

伴隨知識微縮革命及大數據時代的開啟，如何從龐雜的巨量資料中進行資料探勘（data mining），以萃取重要資訊，成了二十一世紀研究者必備的能力，藉由數位技術與統計等數量化分析釐出頭緒，歸納、詮析資料與資料間的主要內容、趨勢與關係、影響，是新時代研究者的重要學術能力。因應著文獻數位化的新時代命題與數位人文新技術的開展，實質開啟了數位技術結合人文思維研究的觀念史新方法與新視野。¹³⁸ 透過數位技術與統計理論協助人文研究的新方法，進行觀念與事件、行動之互動研究，不僅呈現出數位與人文合作的可能性與前瞻性，也開啟了數位人文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方法新思維與研究新進路；在大數據時代，或也可能促成概念史／觀念史研究由「語言」朝「數位人文」的轉向，未來數位人文學在「技術」、「應用」、「方法」層面若取得更進一步的拓進、精深，而涵具一定的學術高度，則當能對概念史／觀念史有新的方法上的更新與革命性的研究突破。

七、餘論

概念史／觀念史研究是一種方法、一種視角。以概念史／觀念史

¹³⁸ 參見鄭文惠：《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發刊詞〉，頁XIV-XV。

為核心的跨領域的文化考掘學，由三〇年代美國以 Lovejoy 為核心的觀念史研究到七〇年代英國劍橋學派 Skinner 與 Pocock 的政治思想話語史研究，與德國 Koselleck 的概念史研究遙相呼應外，隨著當代數位微縮時代的推進，更開啟了概念史／觀念史的數位人文研究的新視野與新趨勢。為打破目前學科分科專業化傾向所造成知識的隔閡、割裂狀態，則致力於跨文類、跨學科、跨領域的概念史／觀念史研究，當是重啟越界研究對話與交流的可能方案；透過概念史／觀念史的文化考掘學，當能較有效的考掘出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及觀念形塑的脈絡，尤其是概念／觀念在共屬於思想體系的有機體中多音複調的重層性與文化越界的流動性。然而，概念／觀念在跨語際實踐過程中，透過不同媒介的文化翻譯與隱喻工程，跨越了語言與文化的邊界——轉為智性工具與思想資源，使文化母體面對他者不斷地重組和轉化自我的同時，要察考中國近代概念／觀念在東亞／全球語境中的社會生成意義與脈絡化轉向，這實非傳統研究某一人物、某一論著、某一家派、某一領域，即可揭示概念的引進、傳布與觀念的形塑、變遷的總體樣態。但，因應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隨著研究型數據庫的開發與概念史／觀念史的數位人文研究，不啻提供了概念史／觀念史研究由「語言」轉向「數位人文」的一個新的契機與新的可能性。以人文學者專業為主體，透過研究型數據庫的建置與數位運算技術的開發，從提供高信度與高效度的統計分析數據到在巨量數位文獻中挖掘關鍵詞與關鍵詞叢的使用、關係與共現頻度和意義變化等，以判定相應於新概念／觀念的出現、變化和定型的軌跡，以揭示新思想意識形態的形成，當能更具效力的揭示出觀念形成、變遷和重大事件、社會行動的關係，客觀而整全地掌握觀念轉化為社會行動、社會行動又改變觀念的互動鏈，而得以勾勒出「觀念史圖像」中「事件」、「行動」與「觀念」間互動的大歷史結構。

人文思維與數位邏輯、統計模組結合的概念史／觀念史的數位人文研究作為一種新方法與新視野，迥不同於傳統研究方法與學術進

路，雖然目前只是一種新的嘗試與探索，未來還需有更精進的數位技術與統計模組，及人文思維的統籌，但隨著人文學者在跨領域研究的不斷拓進與學科整合的有效交流與對話，以及研究型數據庫的不斷擴大建置與完善，則以人文思維為主軸，結合數位推論技術與統計理論模組的觀念史數位人文研究，或乃提供了一種勾勒「觀念·事件·行動」互動的大歷史結構的新的學術視域與研究圖式，或也有可能促成傳統思想史研究範式的移位，當然，或也為概念史／觀念史由「語言」轉向「數位人文」提供了一種研究新範式。

徵引書目

- 〈敬告同鄉學生〉，《湖北學生界》第5期，1903年5月27日。
- 《教育通論》，〈緒言（續第7期）〉，《江蘇》第9、10期，1904年3月17日。
- 《辭源》，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10月1版，辰集。
- 〔日〕十時彌著，田吳炤譯：《論理學綱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年1版，1960年三聯書店重印本。
- 〔日〕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初版。
- 〔日〕子安宣邦著，趙京華譯：《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版。
- 〔日〕川島眞：《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
- 〔日〕文學士深作安著，光益譯：〈人格論〉，《新民叢報》第4年第23號〈原第95號〉，1907年11月6日。
- 方 珣：〈柏格森生之哲學〉，《少年中國》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
- 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
- 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新史學》，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版。
- 方維規：〈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二十一世紀》總第111期，2009年2月。
- 方維規：〈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關於定義和方法以及相關問題的若干思考〉，收於馮天瑜編：《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版。

- 王汎森：〈「主義」與「學問」——一九二〇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分裂〉，收於劉翠溶主編：《四分溪論學集：慶祝李遠哲先生七十壽辰》，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6年。
- 王汎森：〈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收於許紀霖、宋宏編：《現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 王星拱：〈物和我〉，《新潮》第3卷第1號，1921年10月1日。
- 王昱鈞、呂翊瑄、蔡宗翰、劉青峰、金觀濤、劉昭麟：〈漢文文獻之外來語音譯詞擷取方法〉，「第四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2012年11月29-30日。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版。
- 守常：〈階級競爭與互助〉，《每週評論》第29期，1919年7月6日。
- 〔日〕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出版会，1983年。
- 〔德〕伯倫知理：《國家論》卷1（接第17冊），《清議報》第18冊，1899年6月18日。
- 李思純：〈信仰與宗教〉，《少年中國》第3卷第1期，1921年8月。
- 〔美〕杜威著，吳康、羅家倫譯：〈思想的派別（杜威講壇）〉，《新潮》第2卷第3期，1920年4月1日。
- 汪奠基：〈數學邏輯的產生〉，《少年中國》，第4卷第8期，1923年12月。
- 汪榮寶、葉瀾編：《新爾雅》，上海明權社，東京并木活版所印，光緒二十九年（1903）6月1版。
- 汪精衛：〈民族的國民（未完）〉，《民報》第1號，1905年11月26日。
- 沈志遠編：《新哲學辭典》，北平：筆耕堂書店，1933年9月1版。
- 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版。

- 沈國威：〈《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書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7期，2010年9月。
- 孟和：〈主義與他的制限〉，《現代評論》第5卷第109期，1927年1月8日。
- [英] 昆廷·斯金納 (Quentin Skinner) 著，任軍鋒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思想史研究》第1輯，2006年7月。
- [英] 昆廷·斯金納，任軍鋒譯：〈言語行動的詮釋與理解〉，《思想史研究》第1輯，2006年7月。
- 沼胡：〈教育私議〉，《江蘇》第5期，1903年8月23日。
- 知白：〈中國教育問題之根本研究〉，《新民叢報》第4年第21號 (原第93號)，1906年12月16日。
- 邱偉雲：〈關鍵詞叢與文本意義挖掘的嘗試：以《清季外交史料》為例〉，收於項潔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
- 金觀濤、邱偉雲、劉昭麟：〈「共現」詞頻分析及其運用——以「華人」觀念起源為例〉，收於項潔等主編：《數位人文要義：尋找類型與軌跡》，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
- 金觀濤、劉青峰：〈歷史研究的客觀性：論觀念史圖像中的真實〉，《新史學》第18卷第1期，2007年3月。
- 金觀濤、劉青峰：〈隱藏在關鍵詞中的歷史世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
-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金觀濤：〈數位人文研究的理論基礎〉，收於項潔編：《數位人文研究的新視野：基礎與想像》，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
- 雨塵子：〈近世歐人之三大主義〉，《新民叢報》第28號，1903年3月27日。
- 侯生：〈哲學概論〉，《江蘇》第3期，1903年6月25日。

- 侯 生：〈哲學概論〉（續前期），《江蘇》第7期，1903年10月20日。
- 〔英〕威廉斯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1版。
- 〔英〕後素：〈西洋倫理學〉，《二十世紀之支那》第1期，1905年6月3日。
- 〔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張文傑譯：《歷史的觀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版。
- 秋 桐：〈復辟平議〉，《甲寅》第1卷第5號，1915年5月10日。
- 耶魯撒冷著，徐彥之譯：〈邏輯漫談〉，《新潮》第1卷第2期，1919年2月1日。
- 胡漢民：〈述侯官嚴氏最近政見〉，《民報》第2號，1906年8月2日。
- 胡 適：〈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文學》第1集，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年。
- 飛 生：〈國魂篇〉（續第三期），《浙江潮》第7期，1903年9月11日。
- 馬星馳：〈外人以鐵道侵略中國之危象〉，《神州日報》，1908年4月14日。
-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華正書局編輯部：《歷代書法論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初版。
- 張典魁：〈陳立夫《唯生論》與柏格森哲學關係之探討〉，《中正歷史學刊》第12期，2009年12月。
- 張 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
- 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1922年），收於《飲冰室專集之四十二》，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梁啟超：〈墨子學案〉（1921年），收於《飲冰室專集之三十九》，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梁啟超：〈德育鑒〉（1905年），收於《飲冰室專集之二十六》，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梁啟超：〈戴東原哲學〉（1923年），收於《飲冰室文集之四十》，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梁啟超：〈雜答某報（續第84號）〉，《新民叢報》第4年第13號（原第85號），1906年8月20日。
- 梁啟超著，底本據林志鈞編：《飲冰室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 梁裕康：〈語言、歷史、哲學——Quentin Skinner 論之政治思想方法論〉，《政治科學論叢》第28期，2006年6月。
- 章太炎：〈與人書〉，《民報》第10號，1906年12月20日。
- 章清：〈「界」的虛與實：略論漢語新詞與晚清社會的演進〉，《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7，2011年3月。
- 陳嘉謨：《因明淺說》，《新潮》第1卷第3號，1919年3月1日。
- 陳綬蓀編：《社會問題辭典》，上海民智書局，1929年9月1版。
- 陳獨秀：〈革命與反革命〉，《嚮導》第16期，1923年1月18日。
- 陶履恭：〈人類文化之起源·續前號〉，《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2月1日。
- 傅斯年：〈對於中國今日談哲學者之感念〉《新潮》第1卷第5號，1919年5月1日。
-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第二屆FTP三校合作國際學術會議：「世界史／全球史視野中的東亞」，2012年12月17-18日。
- 馮友蘭：〈名教之分析〉，《現代評論》二周年增刊，1927年1月1日。
- 馮友蘭：〈柏格森的哲學方法〉《新潮》第3卷第1號，1921年10月1日。
- 馮夢龍：《警世通言》，明天啟四年刻本。
- 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臺大歷史學報》第43期，2009年6月。
- 黃摩西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上海：上海國學扶輪社，1911年5

月1版，戊集。

黃興濤：〈新名詞的政治文化史——康有為與日本新名詞關係之研究〉，《新史學·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版。

黃興濤：《「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版。

〔日〕溝口雄三著，孫軍悅譯：《作為方法的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第1版。

詹明信著，吳美真譯：《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

詹筌亦、王乃昕：〈「主義」的數位人文研究〉，收於項潔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

〔法〕雷鮑原著，余家菊譯：〈心理學研究法〉，《少年中國》第4卷第8期，1923年12月。

〔俄〕蒲列哈諾夫著，鄭超麟譯：〈辯證法與邏輯〉，《新青年》第10卷第4期，1924年8月1日。

趙岐：《三輔決錄》，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1版。

劉禾著，宋偉傑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修訂譯本。

劉昭麟、金觀濤、劉青峰、邱偉雲、姚育松：〈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於中文史學文獻分析之初步應用〉，收於項潔主編：《數位人文要義：尋找類型與軌跡》，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

鄭文惠：〈後遺民時間／地理政治學：溥心畬臺灣風物之文化敘事〉，《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13期，2013年2月。

鄭文惠：〈從概念史到數位人文學：東亞觀念史研究的新視野與新方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

鄭文惠：〈樂園想像與文化認同——桃花源及其接受史〉，收於成功大學中文系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

- 北：里仁書局，2010年初版。
- 鄭文惠：〈遺民的生命圖像與文化鄉愁——錢選詩／畫互文修辭的時空結構與對話主題〉，《政大中文學報》第6期，2006年12月。
- 鄭文惠：〈觀念史研究的文化視域〉，《史學月刊》，2012年第9期。
- 鄭文惠：《文學與圖像的文化美學——想像共同體的樂園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初版。
- 鄭文惠：〈發刊詞〉《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
- 〔德〕魯道夫 G. 瓦格納著，吳億偉譯：〈中國的「睡」與「醒」：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
- 〔美〕諾夫喬伊著，吳相譯：《觀念史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版。
- 〔美〕諾夫喬伊著，張傳有、高秉江譯：《存在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的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 錢病鶴：〈瓜戲〉，《民權畫報》，1912年，《清代報刊圖畫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年。
- 鍾少華：《中文概念史論》，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2年第1版。
- 瞿秋白：〈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新青年》第10卷第3期，1924年8月1日。
- 顏健富：《編譯／變異：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年7月。
- 羅志田：〈新的崇拜：西潮衝擊下近代中國思想權勢的轉移〉，《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嚴復：〈述黑爾格唯心論〉，《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冊。
- 權量：〈憲政平議〉，《湖北學生界》第2期，1903年2月27日。

- 觀 雲：〈養心用心論〉，《新民叢報》第3年第21號（原第69號），1905年5月18日。
-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
- Foucault, Michel (1997 [1986]), "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 In Leach, Neil ed. (1997), 350-358.
-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John Pocock, "Concepts and Discourses: A Difference in Culture? Comment on a Paper by Melvin Richter," in Hartmut Lehmann/ 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nor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Ocasional Paper No. 15,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1996.
- John Pocock,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 in *What is History Toda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88).
- John Zammito, "Koselleck's Philosophy of Historical Time(s) and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Review of *Zeitschichten: Studien zur Historik*,"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9.
- Reinhart Koselleck,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Conceptual Change," in Willem Melching and Wyger Velema, eds., *Main Trends in Cultural History: Ten Essays* (Amsterdam; Atlanta, GA: Rodopi, 1994).
- McCreight, Edward M. (1976), "A Space-Economical Suffix Tree Construction Algorithm", *Journal of the ACM* 23 (2): 262-272.
- Lee-Feng Chien. 1999.
- Quentin Skinner, "Interpret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peech acts,"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I,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I,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the *Geschichtliche*," in Lehmann /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Edited by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6).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 und Sozialgeschichte," in: *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 hrsg. von R. Robert D. Hume, "Pocock's Contextual Historicism," in D. N. DeLuna e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History: Essays Concerning J.G.A. Pocock*, (Baltimore, MD: Owlworks, 2006).

Reinhart Koselleck,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Conceptual Change," 11.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William Walker, "J. G. A. Pocock and the History of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Assessing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Eighteenth-Century Life* 33, 2009, No. 1.